

第一章 你们所掌握的美

第一节 行为美与习惯美

在社会交往中，人们不仅通过劳动，而且通过自己的行为、服饰以及许多属于品行体系的东西，在对它们所进行的审美评价中，以综合的方式积淀成为情感、理智和意志。

现在，我们想请读者注意一下美的一个分支——人类相互关系的美。

可以不夸大地说，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进行交际的人乃是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最终目的。他的理智和情感的果实有机地嵌进复杂的社会链乃至生物链当中，表现为一定的关系，提供某种价值坐标，表现出某种个性的精神倾向。人类的任何一种交际形式，即便是最简单的形式（比如说欢迎），都会成为人们之间的桥梁或者障碍。它能极其雄辩地表明一个人的文明水平，暴露自我的全部不合谐之处。

因此，人们总是竭力追求完善交际的文明，竭力养成良好的习惯。交往的欢乐从来都被认为是一种人道的现象，而习惯的文明则是精神力量和社会物质财富的一种独特的指示剂。

今天，对人际关系“高质量”的追求尤其显得突出。这

种关系首先是指情感的文明。对于一个掌握大量信息、具有高等智力的人来说，精神——感情的高度发展，不仅使他善于交际，而且使他富有当然的智慧和真正的欢乐。岂不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努力发展自己的交际本领，也不正是因为如此，交际才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因而也是难于掌握的社会活动形式吗？

工业生产的发展顺应着我们的追求，工业产品在不断“追赶”着苏维埃日益完善的审美趣味。

年轻一代利用社会提供的种种可能，要求独立自主地解决这些极其复杂的问题：如何向人们表达自己的诚意，从而避免那些无谓的纠纷？如何使别人对自己产生好感，唤起人们的善意和关切？然而，我们毕竟还缺少行为方法论的知识。而在我们这个交往密切的时代，这实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缺陷。审美观不发达会导致懒于交际。人们由于常常不能对自己的能力和吸引力作出正确的评价，因而即便跟亲近的人也相处得不好。

美学是感性地认识自然、社会（其中包括个别的人）和艺术的科学。在这里研究的是人类交际美的问题。因此，从美学观点来谈论行为，就包括了与人跟自然、跟社会（其中包括个别的人）和跟艺术有关的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在讨论问题时，所要考察的人际关系之美，既包括平时的，也包括节庆条件下的。

什么是人际交往美的基础呢？是才华、教养和人际交往的经验吗？当然，我们在确定某人的交际美时，无权忽视上

述任何一个条件。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人容易找到与人相处的办法，能巧妙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教养却能帮助他找到解决共同问题的焦点。正是在这一方面，我们才能判别那些不与世浮沉之士。这样的人具有卓越的见识，能准确无误地阐明我们行为的涵义。然而，我们的记忆中却不知有多少这样的例子，即那些才华出众的人（其中有博士和副博士）并不能在相互之间找到共同的语言，在基层工作的共青团干部中，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他们并不总是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而其原因——是交际修养太差。

如果说，不论是智力发展、教养水平还是人际交往经验都不足恃，那么，什么才是交际美的首要条件呢？是世界观——关于周围世界的观点、观念和概念的体系。表达了工人阶级利益的马列主义世界观的思想和事业是以美为标志的，是对一切密切或分裂人们关系的东西进行审美评价的基石。它能够使人们的生活充实，具有高尚的涵义，在德、智、体诸方面发展，在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中表现出不易觉察的经验。

同时，美所表现的外部形式也在确定一个人是否美时具有很大的意义。我国历史上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礼貌、风度、漂亮的服饰被认为是与无产阶级相敌对的，被认为是腐朽没落的剥削制度的代表所固有的。当然，旧社会的许多虚文俗套是争取自由的人们所不能接受的。但在过去，却往往把全人类怀抱中孕育出来的合理内核连同这些不能接受的、令人厌恶的东西一并抛弃了。我们认为，这有其客观原因，并不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这是由于缺乏有关的读物，这些读物

直到60年代后期才出现。您只稍回忆一下那些关于最初几个五年计划、关于卫国战争和恢复时期的文献纪录片，就会明白，我们今天的美实在是来之不易的。由于客观需要，当时十分强调重工业的发展。那时候，摆在首位的是满足人民生活必需品的需要，但这绝非意味着，我们“不太理解”个人表现的外在美。

一个文明的人不可能认为良好的举止是资产阶级的，是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然而，在那严峻的岁月，美的服饰和美的举止的确未免显得奢侈。当时，美体现在对于社会主义原则的信念当中，这些原则则是反映战斗和生产中的具体表现、反映具体指标的镜子。

至于那些世界观狭隘的人，则是另一码事（当然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这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道德规范和审美原则一无所知。因此，他们成了一些真诚的糊涂虫，硬把那些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方式当成社会主义。符·靳德尼亚科夫的中篇小说《六十只蜡烛》便描写了这样的一个人。一辈于谨小慎微的叶切文指责他的朋友谢尔盖·克罗波托夫：

难道一个诚实的人，会比一个不守规矩的下流坯更可怕吗？即便这个诚实的人是个糊涂虫。

对，我说的就是糊涂虫！糊涂虫更可怕！后者接着说。一个普通的下流坯会干蠢事，比如说会造谣，但他心里明白自己干得不对。他只不过是违反规矩而已。而那种真正相信在某种幌子遮掩下的造谣以及其他这类匀当为人类所必须的人，对不起，这就不仅仅是违反规矩而

已，他还把这种下流习气当成了规矩。您叶切文不是个下流坯，您是一种对人类有害的思想！

美及其反面——将自己打扮成德行的丑，都会在人们的交际中反映出来。至于谈到那些积极参与并美化人际关系的事物，我们则不能用悲剧的、喜剧的等艺术中使用的范畴去评价它们。小丑的尖顶帽子和朱里·恺撒的血衣倘若不是表现其穿戴者内在本质的某种标志或象征，就不过是一些寻常的物件而已。

我们认为，行为美似乎是人际关系的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亦即基础是社会生活原则所制约的道德规范，第二个层次应称为行为文明，它揭示了实现道德法则（比如尊重）要求的途径以及这些法则（如谦逊、客气）的外部表现形式。最上面的一个层次即第三层次是由行为美来完成的。列宁之所以认为审美能力是人类最高级的精神能力之一，不是没有道理的。行为美必然要求情感——一般说来，是要求美的情感的外现（行为文明）。美的情感提供幻想的广阔天地，能使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促使人类关系的修养转变为这种关系的艺术。关系中的美是一种类乎心灵冲动的直接的东西，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不计利害的，不参杂私心的。贪图好处和非钱莫动的斤斤计较都是与它格格不入的。

对美敏感——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创造善的能力。相反，审美上的麻木不仁则会导致精神上的毛病：爱钱如命、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等等。即便他们披上美的外衣，也无非是在标榜善、标榜人道主义而已。在向道德原则美的转变

中，这种转变并不一定会表现出来。

确定为法则的道德规范必然要求美的行为。

绝不能孤立地来谈论对行为提出审美评价和道德评价的问题。在历史上，对审美的和道德的东西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将它们比作杠杆的两端（列夫·托尔斯泰）有的称它们为亲姐妹（符·别林斯基）

这里所指的是用审美的观点对道德的东西进行的“美化”，亦即善与美的统一，指的是某种行为的感染力。伏尔泰在其名言中所指的正是这种美化。他认为，美之所以比善突出，是因为后者尚需证明其确然为善，而美则无需作这种论证。

谁能以社会生活的实际事例向我们论证美与善的区别呢？人们在作善举的时候，美往往是与苦难融合在一起的。合符道德的东西只有在某个时期才会成为美的东西，正如美的东西只有在某个时期才会成为合符道德的东西一样。

然而有一点毋庸置疑：某一集体中各个成员的行为表明了该集体成熟的公民责任感和崇高风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这里，人的行为美与道德品质的关系是成正比的：道德品质越高尚，行为美的色彩就越鲜明。

尽管审美的东西是“虚的”，但却具有道德力量，美好的感情能使一个人变得更加高尚，能激发他的善意、良心和怜悯心，善能够激发美。难怪高尔基曾多次重复：“美学——这是未来的伦理学。”

美的情感具有社会性，因而可以称为社会情感。 先进集体

体成员的集体主义是人类本性感情的方面各种代表思想的结晶。这就是为什么美的交际确立了人们与祖国、各族人民、劳动、社会主义所有制、知识积累以及将这些知识转变为信念的关系。

习惯美包括业余活动以及学生在校外的社会政治生活。这里指的是业余或课余时间的私人交往，在公共场合的表现，消遣娱乐和物质享受的安排，以及与满足物质和精神需求相联系的劳动。可以有充分的根据肯定，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从事于社会有益的事业，恢复精力，使自己的兴趣爱好更加和谐，掌握人类的文明。只不过我们所从事的于社会有益的活动不是直接的、有组织的，不是象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在学习上和工作中，而是间接地去从事。

既然日常生活环境具有选择性并受个人爱好的制约，那么正如个人嗜好一样，物质享受也应具有审美特征。不言而喻，让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带有美的印记和良好趣味的印记，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在日常生活环境中，道德规范的外部形式以毫不掩饰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且证明：道德规范、交往文明与情感美在何种程度上变成了自身的特性和个人的要求。

可见，在人类价值体系中，美起着独特而又十分重要的作用。每一个行为，正如每一件日用物品一样，都具有双重因素：审美因素和道德因素。

在柏林特列普托夫公园的烈士公墓里，有一座伍切基奇塑的雕像——一个苏联战士一手持剑，一手抱着婴儿。如果

认真思考其中深刻的道德涵义和美学涵义，便会认识到这是一件天才的艺术作品，便会将它的种种优点集中到一点：这便是人道主义和对人类的爱。这是一个伟大的、正义的勇士的形象，一个完美的形象。

无论是在生产环境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所进行的道德探索和审美探索，都应当归结到一点——人性。

第二节 我们是自己人生之剧的作者

有利于人类关系美的社会现实条件，就内容而言应当是人道，就形式而言应当是美。

然而文明的发展和审美的完善并不完全取决于社会条件。仅仅从外部环境的作用出发，就不可能充分解释先哲们的行为。

陀斯托耶夫斯基在《死屋笔记》中就曾精辟地指出：“即便它（外部环境）的确迫使我们接受许多难以忍受的东西，但也并非总是如此，而有一些老奸巨滑的骗子正是以这种环境的影响为口实来掩盖和辩护自己的弱点，甚至常常是下流行径，倘若这些骗子能写会说，那就更是这样。”

陀斯托耶夫斯基的这席话触及了我们今天的某些人。的确，社会为人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又如何来解释：还会有相当多没有教养的人；更令人遗憾的是，还会有刑事犯罪分子；在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具备的崇高情操之中还会“掺进”凶残、自私、横蛮、无礼、盛气凌人、虚伪欺诈？

一位母亲写信到编辑部来请求解释：她曾在现实生活中苦口婆心地教育儿子树立善良、人道、忠诚的理想，结果发现他全当了耳边风。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她的儿子在人生道路上所见识的人们会把善良当做无用，认为人性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呢？这些令人伤心、愤懑的问题引我们深思：能够用“客观”原因来为恶、丑辩解吗？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以社会存在在对个性形成具有一定作用的原理作为出发点的。因此，我们必须断然抛弃那种认为个性形成与经济的、政治的、阶级的和精神的因素无关的观点。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个性必然取决于周围环境。众所周知，在一定条件下，答案必须到情感方面的兴趣爱好中去寻找。这些兴趣很难用通常的社会成规去衡量，而应当进行特殊的研究，应当精心培养、善于培养。在这方面，恐怕还得首先弄清楚，客体对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我们所接受的是它在我们的外部感觉记忆中“留下印记”的形式。在此之后，一切都取决于内心的激情感受，取决于思维活动。在形象的任意组合和分解活动中，外部形式具有内在的内容，而这些形象在思维的综合和分析过程中具有鲜明的色彩。可见，感情是人类行为的“燃料”，而知识则能形成行为的相应结构。

按常理，每个人都能够而且应当调节自己的感情和知识的关系——任何片面性都是不足取的，都是一种终身的遗憾。普希金说：“那种洞察一切、其经验使心灵变得冷漠的人是可悲的。”高尔基对此更无妥协的余地：“我不喜欢那些虽然

聪明、但却感情淡漠的人。他们全都是粗野的，极其粗野的。”另一方面，那种缺乏坚定的道德原则的多情善感也仍然与社会的人的完美无干。相反，照别林斯基的看法，“应当使感情产生思想和表现思想，缺乏思想的感情属于动物，它们只会使人变得低级庸俗。”

的确，社会也为发展兴趣提供了条件。然而，一般说来，兴趣的倾向性都是每个人自己所决定的。社会提供知识，提议并强迫人接受自己的行为方式，但是，感情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行为动力，乃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应当激起的。照马克思的说法，人不仅是演员，而且是自己人生之剧的作者。这就是说，行为不可能完全是由外部条件（即便是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个人的主观条件具有很大的意义。它的思想信仰和道德信仰与灵敏的心灵紧密结合，最终决定了自我调节行为的能力。所以，我们应该真心诚意地尊重别人的感情，即便他是自己的朋友甚至是兄弟。阿纳托里·阿列克辛的中篇小说《我的哥哥奏黑管》中说的一个女孩子如何想帮助自己的哥哥——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她想帮得恰到好处，使他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看来，她是出于一种极其良好的动机，才开始“调节”哥哥的私生活的。当她看到哥哥恋爱的时候，感到痛苦不安，便千方百计地破坏哥哥的恋爱。她“以哥哥的名义牺牲自己”，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不惜编造谎言去离间哥哥与他所爱的姑娘的关系。她终于听到了哥哥严厉的声音：

“应当说你的做法是很卑鄙的……”

“不过，你要知道，我是想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你，我准备牺牲……”

“这是一种专制暴君的行为……，人们为了一些人而牺牲世界上的一切，而这些暴君却想牺牲这些人。”

“这岂不是说我无权干预吗？”

“难道会有这种特权吗？……谁也不会有……”哥哥反问。

单从社会生活或者单从个人生活中是培养不出行为美来的，它同时是社会心理和个人动机的产品。个人的东西常带有社会的职能，而社会的东西也打上了个人的烙印。

每个人的行为美都是在掌握社会审美修养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而审美修养又与每个人的行为美有着直接的关系。尽管一般和个别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矛盾重重，然而，正如可由一滴水看到大海的特性一样，我们也能够从一个人的身上（极少的例外）看到一个民族的审美修养。

所以，审美倾向性的强弱与个人的追求、与自身的主动精神有直接的依从关系，正是有了这种主动精神，人才能决定外部环境，而不是外部环境决定人。要使石头发光，自然必须打磨，但石头自身也要“想”发光才行，即是说，它具有内在的发光性能。

人际关系之美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表现，而且是一种反映到外部来的内在特质。内在的美尽管受到外部世界的积极干预，但它却会对外部世界产生反作用——就其本质而言，这便是“内在的视觉”。

在某种现象的社会本质转化为个性本质的过程中，内在视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我来说，某种事物的涵义（它仅仅对与之相应的感情具有涵义）的净化，跟我的感情的净化完全一样。”马克思所揭示的这种生命活动的形式转化为个人对周围世界的审美关系的规律，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因此，修养高的人理解周围世界的的能力决定了他的道德观念、审美观和文明。人类行为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水平，而且取决于人生命活动中精神范畴的发展，其中包括行为美的发展。我们越是使周围世界富于人性，我们自身就越更人道，就越能使我们的文明趋于完美，就会使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美好。

美学中有这么一种看法：美感最突出的特点是其非功利性，摆脱了任何利害的权衡和物质的欲求。

德国哲学家康德所阐发的非功利思想首先指的是艺术——作品中所描写的到底是确有其人抑或是艺术家所臆想出来的，这都无关紧要。而且，从实用目的的观点来看，建筑装饰绘画和小说会对社会有何益处呢？然而，倘若认真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作品中的实际好处还是有迹可寻的：艺术能使人（只要他不是目光短浅的小市民）摆脱实用主义，使他接触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头脑变得更加清醒，而这一切，自然又会对他的德育和智育发生作用。在人际关系问题上，是没有非功利思想的公开市场的。试想，倘若我们的服务对象是一个永远也不会遇见的人，这会有什么益处可言呢？

一般地说，我们对朋友和客人是客客气气、礼貌周到的，而对亲人和同事是十分关切的。我们“需要”这些人，我们任何时候都有权向他们“讨债”，而他们出于人类的天良也应加倍偿还。也许，用“讨债”这个词未免有些粗鲁，可是你不妨回忆一下：当别人以粗暴对待您的好意，以冷漠和虚伪对待您的爱戴的时候，想必您当时就会感到非常委屈吧。

不过，我们却不能向一个陌生人讨债。这是因为：首先，我们还没有弄清楚跟自己一起排队或坐车的人是否真正具有可敬的品质。其次，我们与此人匆匆相逢而后再匆匆分手。为什么要白白浪费自己的满腔热情呢？我们又不是普照万物的太阳……

我曾经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

刺骨的寒风猛击着公共汽车前面的挡风玻璃，从车窗的缝隙里挤了进来。我们已经在茫茫雪海中挣扎了好几个钟头。对面开来的车辆惶恐地响起喇叭，用车灯发出信号，有的车子干脆避到路旁。

我们的车子顽强地向前奔驰，因为车上的供暖设备出了故障，而离城还有一百五六十公里，绝不能在途中稍事逗留。人所共知的那种思亲之情使我们急着早些冲出雪原，回到家中。然而恶劣的处境与迎面开来的汽车发出的令人不安的喇叭声却使我们连打个盹儿都办不到。

除了我之外，公共汽车上还坐着两个姑娘，看来是两个大学生。起初，她们叽叽喳喳地闲聊那些全世界的姑娘都爱

闲聊的话题。然而，当我们进入雪原之后，她们就不再吭声了，冷得缩成一团。她们一会儿因为天黑和狂风咆哮而感到恐惧，一会又冷得浑身哆嗦。

“没关系 姑娘们 我们在天明之前就能开出去。”我说道，想给我的两个同车女孩子鼓鼓劲。姑娘们笑了笑，但笑得挺不自然。她们的笑声不象我在一小时之前听到的那么富有朝气，使人感到十分可怜。我从旅行包里取出一件绒衣（这是我带给儿子的礼物），又脱下自己身上穿的一件毛衣，然后叫两个女孩子马上穿上，好让她们暖和一些。两个女孩子才觉得暖和一点儿，又开始讲起话来。原来，她们是一对双胞胎。一个叫斯维达，一个叫尼娜斯维达在医学院念书，而尼娜进音乐学院。当斯维达说她们俩的父母住在彼得洛沃克、她们家姓托卡列夫斯卡娅的时候，我不禁想起我的一个老朋友：

“你们祖父不是叫维克多·普拉托诺维奇吧？”

“正是他。”姑娘回答道 对我的问题丝毫不感到惊诧。
“大家都认识他。”

我简直不敢相信居然有这么巧的事。我十分了解维克多·普拉托诺维奇。我们从斯大林格勒一直打到柏林都同在一个连队。他当时真是一个勇敢的小伙子！战争让我们相聚，又使我们分离：后来我进了医院，而他这个幸运的家伙却得以参加攻占德国国会。

不过，我没有对她们提这些事。我想挑一个星期天坐车到老朋友那里去，那时定会让这两个黄头发的姑娘大吃一

惊。

这是怎么啦？汽车晃动起来，慢慢向右边倒下去。我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一个书包就打在我的脑袋上，顿时觉得天旋地转。斯维达绝望地惨叫一声，尼娜朝后面倒去。传来了窗玻璃碎裂的声音。我们好不容易才从车里爬了出来，幸好谁也没有受伤。只是那恐怖感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离开我的两个旅伴。

过了一会，一辆伏尔加开来的车将我们载走了。姑娘们平静下来，慢慢恢复了兴致。她们悄悄地说了几句话，又交换了一下眼色（我从反光镜里看见的），然后分别从身上把毛衣和绒衣脱下来，说了几句感激的话，仔细地把它们放进我的皮箱里。

总算进城了。

“姑娘们，我说，请等我一会儿，我到食品店去买点吃的。给我照看一下皮箱，我马上就回来。”

您们想象得到后来发生的情况吧？当我从食品店出来的时候，两个姑娘已经不在车站上了。透过刚刚开走的那辆电车的车窗，我看见了我方才的那两个旅伴的帽子和瘦削的背影。我的皮包孤零零地放在雪地上，漫天的雪花从四面八方方向它袭来。

我只感到心里难受，但是说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我把去看望维克多·普拉托诺维奇的打算搁置下来了，也不再想进斯维达和尼娜的家门。我怕那样会使她们感到难堪。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过，你想想，连一句“再见”

都没有说啊。

乍看起来，我的熟人确实说得有理——当时的情况和当事人的内心活动使他有理由要这样说、而不是换个别的说法。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姑娘们未等旅伴回来就先行离去。或许，她们是急着去赴爱人的约会；或许，是母亲病重在床盼着她们速去，因而她们无权不珍惜时间。从这个角度来看，她们确实无法去作别人期待于她们的事情。不过，倘若过了许久之后她们仍然不去感谢自己的旅伴（她们是知道他的工作地点的），那我们就有权说，她们的行为不美。

不过在上述故事中，尼娜和斯维达是作为忘恩负义的代表来看待的，这种人古已有之，活该遭到鄙视。您想必记得，伟大的意大利诗人但丁就是把“忘恩负义之徒”放到他用想象创造出来的最可怕的第九层地狱中去受煎熬的。

社会生活向我们提供的大量例子证明：即便对素不相识的人也应有良好的举止，而那种普遍流行的关于美感的非功利性的观点其实是漏洞百出的。

对于美的吸取也是理性范畴的事，并不仅仅局限于感情、激情和心情。二者在人类心理的潜意识中形成的统一是隐蔽的。甚至可以满有把握地说：美育越发展的人，他身上的理性的东西就越少直接间接地表现出来，因为他善于通过激动人心的认识范畴去捕捉和感受人生的复杂“香味”。

玩世不恭的人要么无视集体意愿，要么是鄙弃人类传统

的可怜虫。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在普希金的《溺死鬼》一诗中，那个农夫是如何因为自己没有安葬溺死者而常年苦恼不堪的：

整夜里他都在发抖，
尽想一些可怕的事情，
仿佛有人敲打门窗，
一直敲打到天明。

农夫违反了举世公认、人人适用的自然法规（应当掩埋死者的尸体，而不应当将它推入水中）因而理应受到惩罚。

这便是美感的“非功利性”——它不仅是道德上不可缺少的一种东西（上面例子说明人死了也要补这一课），而且也是生理上的一种需要。后一方面，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妇女除了比男人更柔弱之外，她们还负担生儿育女的任务：她们现在当了母亲或者将要当母亲，因而要求丈夫特别关心自己。

然而不应忘记，天性毕竟不是最终决定一个人的性格和审美爱好的东西。对于这个问题，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写道：“人的天性只能向人提供那些可能成为审美趣味和审美概念的东西，其环境条件却决定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的转变；只有这些条件才能解释，何以特定社会的人（即特定的社会，特定的民族，特定的阶级）具有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概念是这一些，而不是另一些。”

那么，我们的美感到底如何呢——我们的言行任何时候都是美的吗？在进行自我评价的时候您不妨分析一下，您是

如何对待别人的，特别是如何对待那些素不相识的人的。照斯汤达的说法，这是一面不能回避的镜子。它能使您好好的审视自己。应当说，想通过别人来评价自己的行为是很难办到的，而且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乌赫托姆斯基院士说，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将自己的全部心力、全部重力、全部目标集中到一点，以求突破自我的疆域，找到通向汪洋大海的出路，进而达到‘你’。这是完全可能的，任何一个真正热爱人类的人都是懂得这一点的。”要是您以自我为中心，您就不可能看到周围的世界和周围的人有美有丑，有喜有悲，您就会完全局限在自己的狭小天地里，而审美评价自然也就等于零。

所以，美的概念就位于社会特性和个人特性的交叉点上。当然，绝不能使这些特性中的任何一个绝对化，无论是社会特性、个人特性，抑或是生理特性，它们互为依存，互为交织。这种情况显然会使确定行为的美丑变得颇为困难。

这里举一个例子。维克多从房管所原先所在的那幢大楼下面走过的时候见修缮工作已近尾声了。他想：“这幢房子大概又要用来作什么用了吧？要是真在里面办个象棋俱乐部，那倒挺不错。”

“姑娘，”他问一个身穿工作服的女工人，大概是技校来实习的；“请问这里修来干什么用？”

“会挂牌子的，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

不知维克多是一时找不到话回答，还是干脆就不想吭声。可是，待他去买了东西又回到这里来之后，就再也咽不下这口气：

“请您原谅我又来打扰您，可是我有一个初步印象。似乎您不是一个不懂礼貌的人。”

“您是怎么啦？”姑娘回答他说。语气变得柔和了。“我们自己也不太清楚。听说是要办个象棋俱乐部。实在对不起，每天都有人在问，烦得我不想回答了。”

维克多与这个姑娘之所以能够友好地分手，是因为其中的一个善于寻找表示行为的适当措辞，没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在从审美角度来考察交际的时候，首先要注意它的形式美。将“交际形式”这一概念用来指经过美化的言行。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在以往的岁月中，我们赋予自己的态度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形式呢——是彬彬有礼的，还是充满善意的呢？这里就表现出我们的道德意识。马克思说：“……一个粗野的、没有教养的人之所以会把别人看作世界上最庸俗的无赖和最下流的混蛋，是因为别人揭过他的毛病，他把自己的毛病当成了衡量人类行为的标准。”

在会议上可以批评自己的同学糟透了，因为他学习不好，散散漫漫。就算你说的千真万确，但您在为自己的真理辩护时忘了他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去年他曾发起为卫国战争伤残战士募捐的运动，差不多有一年时间他都在领导全市的排球队。

应当全面地来看一个人！这样你才会尊重别人，这样你才会找到正确的处世之道。

要知道，每个人在谈到自己的时候都可以使用诗人叶甫杜森科的诗句：

我是一个复杂的人——
我是垂头丧气的
又是精神抖擞的
我是与世无争的
又是不合时宜的
我是无与伦比的
又是倒楣透顶的
谦恭而又粗野
凶狠而又善良。

当你从任何一个侧面，按照任何一个坐标去观察人的时候，都会发现存在着两极：正与负，是与非，有与无。那时，如果你试图激起人的内在力量并最终激起每一个人身上都存在的人性，就会取得成功。

在生活中，可以遇到许许多多由于深信人类之美而摆脱粗野、流氓行为的例子。

莲娜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就这样写道：

有一天我从女友处回家来，突然从墙角边走出三个小伙子，对我说了许多不堪入耳的下流话。我只当没看见他们一样，从他们身边走过去。这时，他们其中的一个赶上来，说道：“跟我们一起走吧。”我对他说：“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样做？你不是这种人啊，是吗？”显然，他万万没有料到我会这么回答，于是就象保镖一样跟在我后边。“哥儿们”对他嚷了些什么，他也不理睬。他就这样跟着我走到大门

口。我进屋之后隔着窗子，看见他还在门前站了许久。

过了几天我碰见了她，于是我们交谈起来。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极少读书报，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后来我才知道他叫谢辽沙，是个孤儿，从小遭人白眼，因而学会了喝酒和干那些下流勾当，上班时到处游逛。他到我这里来时也是醉醺醺的。我还是决定继续跟他往来，让他读书，跟他一起报名参加篮球队。还辅导他考技校，他果然考上了。现在他正读函授学院，已经结了婚。我跟他成了老朋友。我感到高兴的是，当时没有瞧不起他。

为什么莲娜能够使那小伙子悬崖勒马呢？显然，这是由于她关注了那个想欺负她的人的内心世界，使其中深度昏迷的美苏醒过来了。姑娘在与他的友谊中坚持了这一方针，并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圆满的效果。所以，即便是那些幼稚无知的人身上也有内在的美，但这种美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语。我们每个人的艺术在于，要使这种美用人性的语言发表自己的见解，也即是要善于将人引导到自我斗争的道路上来。至于我们自己，则完全用不着客气。倘若以为谁会为我们扔下一个救生圈，那只会使自己的疾患加重。古话说得好：“求人不如求己”。

的确，决定我们的行为是美是丑的关键不在于老师，也不在于家庭气氛，归根结底在于我们自己。因此，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改变我们的行为，只要美成了我们心灵的需要。

第三节 与人相处意味着什么

很难想象，让一个不懂交通规则的年轻人去开车，会给他自己和别人带来多大的不幸。

不过，要是有人在电车上踩了你的脚而又不道歉，要是有一伙人冲进你的房间，在你姐姐的病床前笑闹，要是您挑担子折了腰而走在您旁边的年轻小伙却视而不见，大谈其运动成绩——他一次不幸都没有发生过，你会怎样呢？看来他们都是朝气蓬勃、体格健康的吧？真是朝气蓬勃、体格康健吗？其实哪里是这样！冷酷无情，横蛮无礼，对别人的命运麻木不仁，都会置人于死地。

与人相处——这就意味着时时刻刻都要不断完善自己。只有跟自己的毛病和弱点进行斗争，才可能产生美与善、正直与无私、博学与高尚。这就意味着每一步都要为别人着想。因为不仅是某个人、而且是我们大家都必须同冷酷无情，同公开的或隐蔽的横蛮无礼、同麻木不仁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是不可调和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而当优秀的、文明的人们为了捍卫真和美而牺牲的时候，它的结局又是十分悲壮的。

年轻人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去捍卫真和美的例子实在是多得不胜枚举。这样的人将长期乃至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他们的功绩感动着我们敏感的心灵，促使我们吸取那些高尚而又永恒的东西。

与人相处的确不是一件个人问题。索居独处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往往跟与人相处时不一样。高尔基有一次观察到：有个人在走过空无一人的客厅时，将帽子取下来，对着镜子中自己的鞠躬致敬。契柯夫坐在自己的花园中时，曾用帽子去接太阳的光，想将太阳光连同帽子一起戴在头上。倘若他们发现有人在观察自己，一定会非常狼狈。

但是严格地说，我们从来也不会索居独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许多人的因素构成的，要是我们当中有谁死掉，我们的自我中就会减少一个成分。

17世纪的英国诗人约翰·堂恩写道（采用李尧、温小钰《钟为谁鸣》中的译文）：

谁也不能象一座孤岛，
在大海里独踞
每个人都似一块小小的泥土，
连成整个陆地。
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去，
欧洲就会缺其一隅，
这如同一座山岬，
也如同你的朋友和你自己
无论谁死了，
我都觉得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
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因此，我从不问这丧钟为谁而鸣，
它为我，也为你。

在社会上，我们每个人都扮演着规定扮演的角色。与性别、年龄、社会地位、处境等相适应，社会要求作某些规定。儿童认为正常的事情（如雨后光着脚叉子跑），成年人却不能去做。看足球赛时可以在看台上大喊大叫，可是要是谁在看戏时喊叫，就会被认为是无赖。妇女可以接受的东西（如穿裙子），男人则会认为不成体统。社会要求我们制定规矩。

因此，应当随时学会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公认的准则，维持自己周围的社会秩序。这显然并不那么简单，因为“行为美和习俗美”这一概念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

加里宁认为，文明包括了从洗脸到最高级思维的范畴。马卡连柯对青少年的美育问题进行过细致的考察，并将这些问题归纳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他对用餐规定也十分重视。原来在吃饭的时候，不仅应当关心自己的胃口，还不能败坏别人的食欲，影响他们的情绪。

今天对于亲切的微笑、热情的握手和推心置腹的交谈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昨天。我们每个人都体验过这句古代谚语的真理：“没有什么象礼貌那样值钱，也没有什么象它那么珍贵。一句温暖的知心话会使人精神振奋、充满希望、受到鼓舞。

为了使自己的行为文明，必须做到：

- 开扩自己政治眼界，认真执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
- 使自己的智力和体力更加完美。否则，我们与人相处时就会十分沉闷，而别人也找不到与你共同的语言。试

用，有谁想在社会上沉默寡言地消磨时间，更有谁想跟一个前言不搭后语的人交谈？不过，要是你的体质不好，走路弯腰驼背，即使想帮助人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顶多只能找一个漂亮的女伴跳跳舞；

—— 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否则，思想与感情、意识与观念、理想与幻想也跟其他道德标准一样，不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您就会自动放弃创造，丧失生活情趣；

—— 培养对人们的爱。如果您不信任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善意，您就体验不到欢乐。图尼亚柯夫在1917年谈过这么一件事：有个小伙子在我前面一公尺左右的地方走着。他回过头来，看见我走在他的背后，就拉开弹力很大的弹簧门，脸上笑眯眯的，而这，信不信由你，会使人的生活变得愉快一些。的确，正如一位东方哲人所说的那样，您的良好心境是你贡献给亲人们的一份礼物。同时，这也是您贡献给自己的一份礼物。

加里宁强调：“人应当爱别人。如果他爱别人了，那他的日子就会过得更好，他的生活就会更欢快，因为世上没有谁的生活会象厌世者——仇世者那样糟糕。这种人的生活是最坏的。”

—— 培养自己的审美趣味。否则便不能理解人类感情的美妙之处。美应当成为一种精神需要。美可以使人生活得富有情趣，否则并非任何时候都过得称心如意。它能够使我们富有同情心、具有吸引力、真诚和廉洁。

在社会生活中，上述种种品质都是互相联系的，而且可

能集中地表现在其中的某一个成分中。

……汹涌澎湃的大海将一个小女孩卷进了自己牢固的怀抱之中，母亲冲进水中，但她也被大海吞没了。吊桥上有二十来个人站在那里，可是一个个袖手旁观，没有谁愿去帮助落水的人，大海实在太可怕了，要跟它搏斗委实太危险。

纳基奇此时正从这里走过，当他得知发生的事情之后，当即跳进泡沫飞溅的波涛之中。先捞起来的是当母亲的，她此时已经奄奄一息。他将她放在缆绳上，猛吸了一口气，随即又去打捞孩子。当将孩子捞上来时，母亲又被海浪冲走了。应当去救这个妇女，可把女孩往哪里放呢？此时，纳基奇万般无奈，只好把虚弱的孩子放在漂过来的一段木材上。

他又返身去寻找那当母亲的，可女孩又被激浪卷走了。

这时，纳基奇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筋疲力尽了。

通往海岸的道路被吊桥截断了。海浪恶狠狠地将他砸在一根木桩上，想任意惩治他，折断他的骨头，夺去他的生命。在绝望之中，他对那些看得津津有味的人高呼：“快来帮忙吧！”似乎他们并不知道掉进大海里的人需要帮助。走到这里来的卡苏姆跳下去了，他跟纳基奇一起先捞起女儿，随即又将母亲打捞上来。于是，在这种危难时刻，对人的怜悯和着重变成了英雄行为。

可见，行为美是跟为别人着想、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等密切相关的。要是这一切都形成了常规，习以为常，那这样的人就是美的。

第四节若要飞翔，须展两翼

在交际过程中，我们每个人的文明都通过各不相同的能力指数表现出来，这是指在具体环境中使自己的行为得当，有利于达到某种实际效果（如使别人尊重自己）的能力。文明使人受到一定的约束，但同时又象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每一步都是通向自由的。实际上，智力的发展，精神世界的充实，科学世界观的树立，知识向信念的转变——这一切都会赋予我们超脱陈见的情感和乐观地看待人生的信心。人正是在文明中找到了自己天性的表现：充分地显示自己的情感、体力和聪明才智。

正如鸟儿有一只翅膀受伤就不能腾飞一样，若是人缺少公认为内在文明的东西或者缺少精神协调的外在体现，那就不可能按正常的人类关系跟别人交往。

古时候，人类文明中的内在文明与外在文明的区分具有极大的相对性。当时摆在首位的是人体美。这在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而这些神话又对古人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神的表现都是不道德的。在神话传说中，他们是凶狠残暴、喜欢报复、淫荡成性等劣根性的代表。从古老的时候就流传下来这么一个传说：有个女人被指控犯了罪。然而，她在法庭上不是为自己辩白，而是展露自己娇美的身躯。法官看到她身上优美的线条之后得出结论说：长得这样美的女人绝不会犯罪。

稍晚一些年代，哲学范畴中出现了一个词——“卡洛卡加季亚”。它用来指对人的审美评价的两个方面：经过体育锻炼的体格评价与符合美的气概、风度和行为的内心评价。只有外貌美丽、内心善良的人才真正是美的人。为什么美与善会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呢？大概应当这么看：这种联系之所以会成为必然，是由于占统治地位的上层人物及其思想的表述者们竭力将他们制定的道德原则抬高到情感意识的水平，因为这是一种能对社会意识产生深刻影响的有效手段。

美与真的关系也应作为精神文明的一种必要条件而受到重视。按照柏拉图的学说，美不仅是错觉和悦人的幻想，而且是达到真理的必由之路，是通往自我平衡的阶梯。深入地领略美，人才能认识真，而归根结底，“美并不是表现于某一个面孔，某一双手，或是身体的某一其他部分；它也不是存在于某一篇文章，某一种学问，或是任何某一个别物体，例如动物、大地和天空之类，它只是永恒地自存自在，以形式的整体性与它自身同一。”

随后，在斯多噶学派中，人体美所居的首位让给了道德美。比如，古罗马哲学家埃皮克蒂特在自己的学说中就并不将一切美都归结为人体的诱人之处。身体、头发并不美，美的是理智和意志。正象人表现出理智和意志那样，后者也决定着个人的美。

今天，更有外在文明与内在文明之分，而且对后者尤为看重。然而，只有使外在的优美与内在的财富、外在的谦逊

与内在的优点密切结合，人才能戴上美的桂冠。

我们是怎样来理解内在文明的呢？这固然包括深刻的认识——思维辩证法正是以它为基础而形成的；还有高度的劳动素养，发达的能力和技术。然而内在的文明必须以诚实、正义、高度的人性以及理解和欣赏艺术作品中的优秀形象和其他正面人物形象的能力为前提。外在的文明直接依赖于内在的文明。外在的文明便是讲礼貌、有分寸、谦虚谨慎、风度优美、遵守道德法则、语言文明、合理安排娱乐活动、从事体育锻炼。

近来，人们普遍关心外在的文明。这当然无可非议。不过，我们知道，这并不总是内在文明提高的证明。在依里夫和彼得洛夫的讽刺小说《十二把椅子》中，“野人”爱乐奇卡只会纯熟运用 30 个单词，虽然她爱收拾打扮，模样儿也不丑。

人能够掌握外在行为的文明方式，但这绝不意味着他的内心是真正文明的，而只能说明他也是个人。您想必记得列夫·托尔斯泰绝妙的小说《舞会之后》。老将军在舞会上风度优雅，富有魅力，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美。可在舞会之后与士兵们相处时，却暴露出他适才被优雅的面具遮掩住的凶残面目：冷酷无情，毫无人性。

文明的人不仅能在具体乃至复杂的场合中找到正确的行为方式，他自身也在追求一种美的行为。

至于那些缺乏内在文明的人，我们大体上赞同这样的看法：对于他们来说，外在的文明只不过是掩盖丑恶灵魂的花

美外衣。倘若简单化地理解内在文明，把它看成是狭隘的个人行为准则，仅仅局限于会用一大堆表示良好意愿的词语，那这种理解就会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打上否定的印记。

谈到审美的道德方面，我们无权忽视人的外貌，尽管必须牢牢记住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教导：个人的本质不在他的胡须，也不在他的血液，也不在他抽象的生理特性，而在于他的社会性质。人的外貌之所以美，是因为他是千百年来进化的产物。人的骨骼和肌肉能够胜任各种各样的生理功能。没有哪个活人不能做那些复杂的动作，作出那些复杂的反应。对于各种自然环境的广泛适应性，正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之一。一百五十年来在世界各地进行的调查表明，人在体质方面的发展正经历着本质的变化。比如，人的身高每十年平均上升 0.7—0.8 厘米。人的心理（记忆力、思维结构、理解能力等）也越来越完善。

有人将人体组成成分成三种类型：瘦弱型、矮胖型和运动型。

瘦弱型：胸部扁平，脖子长，面部轮廓突出，鼻子显得很长，颅部和额头大，肌肉不发达，身材瘦削，手小脚小。

矮胖型：胸廓宽大，肚子大，面孔下部发达，脖子短，易致肥胖。

运动型：肌肉发达，胸宽，肩胛高，面孔是正方形。

最常见的是运动型，占 47—50%；其次是瘦弱型，占 30%，再其次是矮胖型。

自然，就外貌而论，被认为最美的是运动型，因为它最

匀称。然而也不可过于看重。按照适应规律，机体的每一部分都是与其他部分密切相关的。照季米尼亚热娃的说法，“身体某一部分的过于发达，会导致另一部分的发育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就跟歌德所说的那样，“人体组织只有某些部位营养充足，而另一些部位则须厉行节约。”

因此，每一种体型都有自己的美处。古希腊雕塑家彼得克列特早就指出，人天生就是匀称的。他在自己的论文《典范》中指出，腰线将全身分成两个不相等的部分，其长度比例是：下半段约为全身之长的0.618。

如果一个人额头高、鼻梁直、眼睛（黑色、蓝色、棕色）富有表情、眉毛浓、眼睫长，这样的面孔就会被认为是美的。不太厚的嘴唇、雪白而又整齐的牙齿、不大的耳朵、浓密的头发和健康的肤色也会使面孔显得美丽。

在人体美的评价方面，身高备受重视。这也分成几种类型。

矮 男 130—160厘米，
女 121—149厘米。

中 男 160—170厘米，
女 149—159厘米。

高 男 170—180厘米，
女 159—168厘米。

很高 男 180—200厘米，
女 168—187厘米。

巨人 男 200厘米以上。

女 187 厘米以上。

其实，任何一种身高的人都可能是美的，这取决于许多情况，比如身材匀称、动作美等。当人的动作不自然、矫揉造作时，我们就会感到不顺眼。反之，倘若我们看到的是自然的动作，就会产生舒服之感。

体格美在人的审美品格中并不起本质的作用。正如英国哲学家斯宾塞（1820—1903年）所说的那样，伟大的性格隐藏在不美的面孔后面。反之，庸俗的灵魂则隐藏在美丽的面孔后面。自然，我们初逢一个女人或男人时，会为他们的非凡容貌所震惊，但是，如果这种美是“冰冷的”，就不可能吸引我们，而只会因其虚有其表而使我们不感兴趣。反之，某人的外貌可能不美，但其精神内涵却是美的，光辉的。您想必记得，雨果《巴黎圣母院》中加西莫多品质高尚，意念纯洁，性情坚强，可他的外貌却十分丑陋。

因此，绝不能离开外在美和内在美来侈谈体格美。外在之美与内在优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人是美的；体格不完善而又思想污浊、行为荒唐的人是丑的。

苏联人民艺术家柯宁科夫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人要怎样才算美？……在人的美当中看重的是什么：是精神美，还是外貌美？衡量这些珍贵品质的尺度是什么？”

他回答：“一个人，无论外貌多么完美，多么吸引人，如果他没有真理，我们就有理由给他的‘美’打上引号，我们就可以将这种所谓的美称之为‘美’的幌子。我多年的生活经验证明：人的美首先是追求真理。”

规定自己对人必须讲真话，不对别人也不对自己隐瞒事物的真实情况——这当中便有高度的审美情操。要做到随时随地都讲真话，这的确并不简单，特别是在这种既想赢得别人的爱戴、又想使别人高兴的年龄。

内在的文明是通过美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对于那种不干好事，但却成天炫耀自己的善举，吹嘘自己具有内才和纯洁无私的人，我们往往嗤之以鼻。这种自吹自擂是没有根据的，而我们也把它看成是信口开河的胡扯八道。正如内心世界包含着在具体行为中获得的财富一样，行为准绳，乃至于个别的行动总是与内在的文明相一致的。

文化修养是外在文明和内在文明的产物，它是人类对待世界的一种特殊态度。列宁以深深的敬意谈到具有文化修养的工人，把他们视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典范和精神典范。具有文化教养的工人——基洛夫、诺金、加里宁、波斯得塞夫——构成了共产党的核心。只有在审美方面高度文明的人才是有文化教养的。文化教养以令人惊奇的方式凝结成个人的全部重要品质。并非只有某个特定时期才能成为具有文化教养的人——这根琴弦随时都在发出声音，无时无刻不在准备跟我们的心情发生共鸣。

倘若缺少文化教养这种特殊的品质，缺少这种以渊博学识和入道激情为标志的对待世界的态度，就不可能有任何事业和任何劳动业绩。杜甫仁柯就是这样看的。作为一个作家和演员，他不可能不注意到文化教养并不能在领取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时同时得到。他认为，懦夫有时会装得很勇敢，

吝啬鬼有时会装得很慷慨，下流坯有时会装得很善良，不幸的人有时会装得很幸福。可是文化教养却是装不出来的。

苏克森娜认为：“文化教养——这是一颗不安的良心，是一种智慧；要求它为权势帮腔的时候，它一声不吭，而自己不断对‘什么是真理’这个永恒的难题苦恼不堪；它又是一种骄傲……和悲天怜人。这是一种无法逃避、使人烦恼的东西。如果这一切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他就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有文化教养的人知道，文化教养就是一种极终目的。

符拉基米尔·依里奇·列宁就是一个使文化教养与内、外在文明融为一体的典范。不仅是列宁主义学说的强大威力，而且还有他个人生活的光辉榜样，布尔什维克典范的感召力，使得同代人把他当作自己的灵感和高尚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我们在纪念列宁、继承他的事业的时候，也就直接接触到他那成为我们主要生活基础的高尚品质。

的确，列宁在展望未来的时候，看到那时候人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将融为一体。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他所仔细观察的不仅是人民的命运，而且还有每一个具体的人的性格的微妙之处，不管他是工人、农民还是科学家。列宁的文化教养产生于他对真与美必定胜利的坚强信念。

第二章 道德规范要求美

第一节 生活指南

道德规范之于人，犹如远行者的面包、沙漠上的水，没有它们，便没有生命。倘若失去良好的道德气氛，人类社会就可能变成一群野兽。

社会主义为自由的社交、为按美的规律来完善现实生活提供了条件。而最主要的，是克服了古已有之的道德规范与人们行为的冲突。我们知道，远古时期便有了“戒杀”、“戒盗”的禁律。可是在人剥削人的社会里，这种成为法规的要求事实上被统治阶级所漠视。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凶杀成了不成文的弱肉强食法则的基础。垄断组织之间的竞争转化成自相残杀的战斗。“戒盗”这条道德禁律也只不过是写在纸面上的道德法规。其实，未必有哪个剥削者不去侵占别人的剩余劳动产品。的确，这用“利润”二字来表达，总比“偷盗”更冠冕堂皇。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只有新型的社会制度才可能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消除道德法规与人们行为之间的矛盾。行为美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审美表现形式中遵守共

产主义的道德法规。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盲目地执行社会道德指令，任何一项社会法则要求都具有个人的涵义：当我们极其认真、极其诚恳地执行某项法规的时候，我们自然有权向那些“社会利益的破坏者”宣战，自然要尊重社会法规，或者害怕因不履行这些法规而受到惩罚，等等。道德法规具有个性，也即是说，它们在这种意义上具有主观性：缺少人的意识活动，它们就不可能实现。

这里所说的是，道德法规的形成要穿过心理作用的复杂迷宫，社会法则必须为每个人所掌握，然后才能变成具有个性的东西。

然而，如果只是这样来看待问题，即每个人都要求符合其内心兴趣和信念的“自己的”道德，那么社会进步就不会从中得到多大益处。

有这么一种能将我国各族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团结起来的東西。由这个共同的東西出发便能产生真正的博爱，在这个共同的基点上，我们便能观察和评价个人的表现，评价人们履行道德法规的情况，其中包括他们忠诚于社会利益与共产主义事业的情况。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也总是将人们的社会实践摆在首位，其出发点是：只有实践才能检验每个人的道德面貌。

苏联列宁共青团的整部团章中都贯穿着一系列实践的要求。共青团赢得的六枚勋章是党和政府对它为人民所作的贡献的奖赏，是对它的实践、对全体团员积极的人生观的高度

评价。完成既定的目标——建设磁力城和共青团城、开辟处女地等——是客观历史进程和社会呼声的因素所决定的。然而在审美方面和心理方面，这些社会目标永远都具有个性，并且也是按各自的意愿来作出的选择。因此，正如马卡连柯所说的那样，“在我们这里，对于人的道德要求应当高于人类行为的平均水平。道德要求的行为水准应当是最完美的。”在人类行为平均水平与最完美的行为之间的差距中，存在着人们交际美的问题。

我们应当牢记这一点，因而在提问题时就不仅仅局限于劳动方面与行为文明方面。生活要求每个人无论年纪多大、社会地位如何，都要清醒地看到自己的长处，关注生活、幸福、爱情等的意义问题，既把它们看成道德问题，又把它们看成审美问题，因为它们的核心就是善和美。

……两个穿着烫得笔挺的裤子和雪白的衬衫、打着红领带的孩子进门之后，犹豫不决地等了一会，校长才办完自己的事情，留意到他们。

“维奇卡·德拉切夫抢了我们的钱。”个子较矮的那个孩子看到校长皱起眉头，说道。

“怎么抢的？”校长没有听明白。

“是这样先搜了他们衣袋，”男孩子对他身边的同学点了点头，“后来又……”

“等一下，”校长打断了他的话，“我有一点不清楚。说的就是那个七年级一班的德拉切夫吗？”

“就是他。”

校长马上想起了那个长着一头卷发、一刻也不安分的孩子来。几天之前，他才处理过这孩子的事情，当时已经准备好材料，打算送他到劳动教养院去。当校长把这个情况告诉他的母亲时，她说：“随你把他送到哪儿去都行。我年轻的时候，象他这样的人不是叫去放牛，就是喊去打扫牛圈。可现在还得为他们操心，教养他们。我同意送他到劳动教养院去。但愿到那里之后会使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而不至于坏得不可收拾——或者总有一天他会明白，当母亲的是为他好。”可是临到送他走之前，他母亲又是找教育局，又是求校长。她大吵大闹，说是假若将维奇卡送走，就等于夺去她唯一的欢乐，她就要自杀。她又是求告，又是威胁——的确，有谁不理解当母亲的心情呢？对于她来说，无论孩子是否听话，同样都是可爱的心头肉。

德拉切夫安分了几几天，上课时候不捣乱，也不跟孩子们发生纠葛。可是你看，这会儿又惹祸了……

校长再次打量了一下进来的两个学生：他们的目光显露出聪明，但也有几分腼腆。

“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一个七年级学生怎么会抢了两个八年级学生的钱……”

两个孩子这才意识到发生的事情的确很反常。

“是这样……”个子较矮的那个孩子瓮声瓮气地说。“维奇卡在十二月大街上拦住我们。他问：‘有钱吗？’我说：‘没有。’他说：‘你撒谎，把你的衣袋通通翻出来！’这时，格纳正要跑，他朝旁边的那个孩子点了点头，他马上喊道：‘站

住！瞧你这副嘴脸，你想不还债，我可要给你点厉害看。’格纳的脚才动，维奇卡就走上去，搜了他的衣袋，拿走了二十二个戈比，然后又来搜我的荷包。‘哈哈，多的我不要了。’他一边说，一边迅速溜走了。”

“请您千万别把我们报告的事情说出去。他还威胁我们：‘你们要是胡说八道——我们要刺你们几个窟窿！’个子较高的格纳这会儿也鼓起勇气来了。”

“好。”校长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了几步，突然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现在我们来试一下：格纳，我想跑到你跟前来搜你的衣袋，而你，”他招呼那个较矮的学生，“就来保卫你的同学。好，要勇敢一些，再勇敢一些！一个人应当勇敢，加倍勇敢，永远都勇敢！”

要是有人刚好在一旁观看，那必定会认为这个场面十分精采：一个成年人在两个孩子之间狂奔乱跑，想搜其中一个人的衣袋，而另一个孩子却死死地拉住他的裤子。

最后，校长叫孩子们停下来。他看了看他们累得通红的面孔，说道：

“你们想一想一个学生的尊严吧！你们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明白。”他听到了回答。

两个孩子向门边走去了。校长发现：尽管他们仍象先前一样埋着头，但他们的肩膀都挺起来了。“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反常情况，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力气，也不是缺乏信心，而是由于不好意思。”校长对于这点知道得很清楚。可是对下面这

个令他苦恼的问题，他却百思不得其解：“如何来解释象德拉切夫这样的学生的表现呢？是由于道德教育水平低？还是因为胡思乱想？亦或是小市民习气的严重影响？或者干脆就是出于无聊？再不就是天良泯灭？或者是不知道这样做会受到惩罚？”

也可以这样说：“这无非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为这样的小事去绞尽脑汁，那可不值得。等您的维奇卡长大了，他自然就会成为一个懂事的好小伙子了。”的确有过这样的情况。有一句古话说：“人就象座有很小一部分露在水面上的冰山一样，不会没有根基。”在青少年时期，大多数孩子的许多东西都是隐藏在“水下面”的。不过，想必你们会同意这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正潜伏着万恶之源。一个学生今天用别人的大衣来擦自己的脏皮鞋——这在更衣室里似乎没有被人发现，明天他就会再去将电话话筒锯掉一半。当“上了瘾”，就会去偷住宅、售货亭和商店。还会用刀子逼着夺走妇女的提包。

可是某些人明明看见有人用别人的大衣来擦皮鞋，有人将电话听筒锯断，看见有人从别人的屋子里抱着东西出来，看见有人用刀子威胁人，却熟视无睹，不去斩断那根通向犯罪的导线。因此，使别人悬崖勒马，也是一种自尊感的表现。

马克思17岁时在论述尊严时写道：尊严是一种能使人变得崇高的东西，能使他们行动起来，竭尽全力去追求最高的境界。

在使我们立足于世这方面，我们的天赋所起的作用并不超过我们献身社会和全人类进步事业的能力。我相信，你们的记忆中一定有这样的例子：有的年轻人，甚至是很聪明的年轻人，他们对待大家的态度往往十分傲慢，目空一切，有时甚至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这样的行为并不能使小伙子或姑娘更美一些，因为正如年轻的马克思所写的那样，他们的表现并不能证明他们自重和具有高度情操。实际上，这是一种对于自我肯定的错误理解。有时，对于自己社会地位的这种理解将导致错误的自我肯定，导致近似乃至于公开而又下流的犯罪行为。

有两个十年的学生毒打了一个莫斯科大学的小伙子。这个打人凶手的供词是这样的：“我用左手抱住他，把他拖到路边。然后把他打倒在地上（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骑在他的身上，叫他把鞋脱下来。他拒绝了。于是，我就打他的脸，打了一巴掌又一巴掌，血流出来了。这时，我把他的皮鞋脱了下来，扔到一边去。我看见他戴着手表，想看一下时间，就把它取了下来……但没有还给他。后来又发现他的指头上戴着一枚‘星期’牌戒指，就叫他取下来。他取下来了。”

有个十年的姑娘在旁边目睹了全部过程，因此被传讯到庭作了证。由于她不干涉（鼓励性的不干涉）影响了两个少年的“内心平衡”和自我评价，使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丧失了尊严感，错误地以为自己是“英雄”，自己的“英雄业绩”至少会博得“美丽的小姐”的赞赏。

科学无可争辩地认为，人通常要用一定的标准来衡量自己。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精神上的发育不全会导致对自我尊严感的片面认识。更严重一些，会导致极端偏激的行为——犯罪。不用说，这最终会送到法庭上，按法律的尺度来量刑。

责任感是自尊的天然伴侣。如果我们自觉自愿地、真心诚意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如好好学习和工作、为别人做好事、美化生活），那么我们便会表现出自尊。而责任感与自尊感正是形成人类交际美的坚实基础。

我们为什么必须好好工作，文明处世呢？这是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出于需要。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这种需要促使我们树立道德观念，推动我们去寻求新的劳动方式，逐渐地、甚至不知不觉地养成自己的纪律性、严谨性、坚强性格与自尊感。

道德规范要求真正做到有始有终、言而有信，办不到的事就不要承诺。一位古希腊作者说：“美不在讲得漂亮，而在于说到做到。”

严守诺言不仅对集体有益，而且对你们自己也有好处。因为专家们认为，意志教育的基本条件乃是这样一种要求：作出的每一个决定都应当办到，即便看来已经力不从心。其实，对此大可不必担心：生活让我们承担多重的负荷，我们就会有多大的力气。这一点的确应当铭刻于心，特别是那些不能使自己的兴趣服从社会责任的人：他们只是形式主义地

去完成交给他们办的事情，对于新的工作不负责任，不遵守纪律，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抄袭别人的作文，乱解代数题，明明没有完成工作，却偏要说完成了等等，自然都比较省事。

人们的美是从培养自我纪律开始的，要善于将别人的职责当成自己的职责。

“成天只想着自己，什么事情都贪图好处的人是不可能幸福的。”谢略卡写道：“要为你自己生活，就得为别人着想。”

当然，也会有人反对：“要是我全都属于别人了，我自己还剩下什么呢？”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要求人们过军营式的生活，不要求人类实行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只有跟社会密切相关，我们个人的、独特的东西才具有自身的价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社会和个人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当前，每一个社会成员独特的“我”都在众多的“我们”中占有自己的地位。因此，责任感既不压制个性，也不排斥它的特殊性。

我们的道德规范不是某种良好的愿望。它要求社会的每个成员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每个公民都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列宁认为这是衡量每个人的行为是否得当的最高准则。应当尊重社会生活规则，保持社会主义祖国公民的光荣称号，自愿参加社会福利活动，遵守劳动纪律，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所有制，维护国家利益，努力使之繁荣昌盛，保护自然资源和文物古迹。同时，还要尊重各民族的民族尊严，加强各民族

人民的团结，发展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尊重别人的权利和法定利益，全力维护社会秩序，同一切反动行为进行不懈的斗争，关心儿童教育，培养他们为社会效力的习惯，使他们成长为当之无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

这些在以往的阶级斗争中形成的道德规范，今天已经在逐渐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第二节 代与代之间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法国心理学家皮埃龙提出的这种情况：要是世界上只剩下儿童，而成年人都突然消失了，那么，这新的一代是否会继续将社会推向前进呢？当然不会。尽管他们继承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是关键在于他们不能同成年人在一起。青少年在完全独立生活之前，的确不能没有成年人的有效帮助。

列宁曾经多次指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经验是载入了布尔什维克的光辉史册的。这些经验是以他们非凡的坚定性、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大量事实为依据的，它们应当成为“一代又一代新战士革命事业的指路明灯”。我们应当牢牢记住列宁的教导，坚定顽强地学习，学习共产主义。而我们有榜样可学，有极好的熔炼意识形态的学校。光荣的布尔什维克、身经百战的英雄和几个五年计划中的先进工作者向我们讲述了革命传统、战斗传统和劳动传统。而我们也注意地倾听：他们的声音在无线电波里传播、在书刊中召唤、

在直接交往中回响着。

我们在回顾往事，在用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时期英雄的功勋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在注视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劳动成就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的光辉日子确实来之不易。

因此，年轻人如果想成为当代人（系就这个词的哲学涵义而言、而不是按照小市民的庸俗理解）应当永远牢记我们前辈的事业，没有过去的伟大成就就没有今天的聪明才智和未来的美。缺乏对过去的思索也就不可能解释，为什么会有极少数的青年会受到我们的思想敌人的影响。

新型的社会制度提供了条件，使人能够成为大写的人，能够完成他的人道主义使命——在社交和日常习俗中确立美。然而，正如前辈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应当为此而进行斗争。

我们不仅要感谢老一辈给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经验，而且要感谢他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对老一辈的尊重表现在自觉地向他们学习，听取他们的忠告，珍惜他们的经验。尊敬长者——这是一条全人类的规范。世界各民族都毫无例外地有敬老的风俗。

年幼服从年长这一道德义务是俄罗斯勇士结义的基础。在民间史诗《伊里亚反对符拉基米尔的暴动》中，伊里亚·穆罗美茨和多布雷尼亚·尼基吉奇互相宣誓：

哥哥要爱护弟弟，
弟弟要听从哥哥，
朋友要互相维护。

人民的智慧叫我们不要打断长辈的话，即便我们觉得他们说得不。等他讲完之后才说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有长辈的场合不可抢先讲话。

在同满头白发的人说话时，难道可以用跟同龄人讲话的口吻吗？在交谈的时候粗声大气也不成体统。粗声大气只会显得交际修养差、思想贫乏和缺乏起码的生活常识。

反之，如果你们能容忍长辈在他们一生中所形成的爱好和习惯，那就会表明你们具有高度的内在文明和外在文明。即便老一代的爱好和习惯显得“过时”，但他们毕竟是历史的产物，倘若对它们持吹毛求疵的态度，那就意味着蔑视自己的历史。我国的优秀人物永远都关怀着老一代，关怀他们的生活和休息。苏洪林斯基断然反对对待老人的放肆态度。他写道：“世界上有三样任何时候都不容嘲笑的东西：爱国主义、对妇女的纯真爱情和老年人。”

绝不能讥笑衰老和老人。

绝不能做讨老人谴责的事。

如果长辈只有你一个亲人，那你无论如何不能将他孤零零地撇在一边，绝不能让母亲、祖父和年迈的父亲无依无靠。要记住，任何人都有这么一天：除了与人交往的欢乐之外，别无任何欢乐。

在未请长者入座之前，不能坐下吃饭。人类进餐不仅是为了充饥，人们精神的交往正是在饭桌边进行的。

不要等着长辈先向你问好。在与长辈相见时，要先表示欢迎；而在离别时，要先表示祝愿。

似乎可以在这里打个句号了。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在生活中看到，年轻人不尊重长辈的事例实在不少。原因自然很多——繁复的生活未必都能纳入理论的框框。

有时候，老一辈的代表并不能以活生生的事例向我们提供钦佩他们的理由。这样，他们就会使下代受到打击：下一代在还未经受生活风暴的磨难之前，年轻的心灵上便会因长辈的不良习气而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

在这方面，你们不妨回忆一下法国影片《恶魔》中的一个情节。父亲带着自己的儿子到动物园去。售票处前面排着很长的队。父亲装成残废军人，毫不费事地就买到了两张入园券。又有一次，孩子无故旷课，父亲在他的情人——一个女医生那里为儿子弄了一张假证明，为了表示感激，还当着儿子的面吻了她。后来，当爸爸的又去勾引女教师，让她给儿子打了一个好分数。就这样，过了几年之后，报纸上报道说：儿子杀死了父亲。这个离奇的故事雄辩地证明：老一辈的道德基础会对年轻人的人生观发生影响，甚至会把他们引到犯罪的道路上去。对于那些耸耸肩膀，问“是谁点燃了儿女眼中的鄙视之火”的人，上述情节是一个极好的回答。

社会调查表明，年轻人大都是在长辈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开始迷上烟酒的。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要为年轻人辩解。我们的教育机构遍布全国，我们培养人的体制深思熟虑。它要使孩子们从小就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违法，什么会受到公众舆论的谴责。这就使我们有充分的权利要求青少年对不良行为持批判态度，不论这种行为出自

何人。阿列克辛的中篇小说《同时在某地……》谈的正是这个问题。

小说中讲的是，得到灾难信号的不是父亲，而是他的儿子，还未成年的谢尔盖。谢尔盖从一封信中得知，老叶美利亚诺夫过去还有一个妻子。她是个医生，曾经把自己的丈夫从死神手中夺回来，治好了他的病，帮助他念完了大学，可后来他找了另一个女人，即谢尔盖的母亲。

谢尔盖见到这个上了年纪而又十分孤独、非常善良而又非常不幸的女人之后，改变了自己对父亲、对家庭、对人们的相互关系乃至对自己的看法。“在此之前生活对我是如此单纯、如此明朗，使我很少对它产生怀疑。”而现在，我对一个根本问题产生了疑问：父亲行为的正确性和家庭关系的正确性。而且，问题也不在于父亲抛弃了那个年纪比他大得多的女人。“人们各奔东西 这是常有的事情。”问题在于 他永远将她从自己的生活中“开除”出去，甚至在她极其需要帮助的时候也拒绝帮助她。

父亲“理智的”生活信条是跟人们“不理智的”生活相矛盾的。这些信条变成了冷酷无情乃至忘恩负义。

谢尔盖接触到的不仅是人的苦难，而且还有人的冷酷。于是他失去了童年，失去了无忧无虑。“我已经不象先前那么幸福了。后来长大了一些，我才明白，无忧无虑的幸福一般说来都是冷酷和无耻的，因为世上的人远非都是幸福的。我觉得自己路也走得慢了，似乎变得沉重了。其实，我走得跟平时一样快……——只是我的脑袋稍微沉重了一些：我思索

得更多了……”

谢尔盖·叶美利亚诺夫着手纠正父亲道德上所犯的错误，主动去关心父亲的前妻尼娜·格奥尔吉耶芙娜。他知道，这个善良而又温和的女人是多么需要亲人，哪怕只有一个也好。“我准备自己去做尼娜·格奥尔吉耶芙娜所需要的一切，为了父亲，代替父亲。或许，这种成为某个人的保护者和救星的需要，正是男性的成熟对我的第一声呼唤。”

作者让自己的主人翁去进行这样的道德选择：是忠于父亲、忠于他那一套应予抛弃的表面上“正确的”原则？还是忠于自己的心、自己的感情、自己的道德鉴别力、真正符合正义与真正符合人道主义的法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不仅要经受善的考验，而且要经受恶的考验。接触冷酷无情和不道德的行为会使儿子失去童年时代，而青少年则会过早地长成男子汉。人的精神中脱掉一个环节，会对他终身的命运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当一个人各方面的发展与他当时所必须解决的问题相适当的时候，那种年龄都是美好的。

中年人和老年人如果要求年轻人亦步亦趋地仿效自己的行为，那就大不应该。而且显然是办不到的。我们的老同志经受的是那样一种实际锻炼，而所取得的是那样一种实际经验。这些经验我们只能通过文化、艺术和教育来获得。而且，历史证明，年轻人和成年人的分歧任何时候都有。很古老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许多有关这方面的记述，可是今天，这种分歧又是怎么表现的呢？

“我们的年轻人爱讲排场，教养很差，居然敢嘲笑领导，对老年人也不那么尊重。我们今天的孩子们都成了些小霸王，见到长辈进屋，他们也不站起来，还要和父母顶嘴。一句话，他们坏到了极点。”

“要是明天让当今的青年掌握权柄，我就会对祖国的未来失去希望，因为这些年轻人性格暴躁，不能吃苦，实在太糟糕了。”

“我们的世界已经进入危难时期，孩子们再也不听父母的话了。看来，世界的末日已经不那么远了。”

“我们的青年连灵魂深处都腐败了。年轻人们狠毒而又懒散。他们永远也比不上以前的青年。当今的青年一代不善于保持我们的文明。”

第一段话是苏格拉底（公元前470—399年）说的，第二段话是赫西俄德说的，第三段话是一位生活在公元前两千年的埃及祭师说的，第四段话是在古巴比伦遗址的一个陶罐上发现的。

自然对比——这只有在几何学里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由于这些人生活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情况十分复杂，我们犯错误的可能性也很大，因此，如果我们去将他们的话进行比较，那肯定不会准确。不过，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青年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有罪的。老一辈的代表们常常忘记他们青年时代的情况，因而不能设身处地来看待青年人。要知道，他们过去也不善于冷静地讨论问题，分不清有益与有害，大概也不知道衰老不那么甜蜜，不知道他们随

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需要真心的眷顾与温情。要是他们今天不能正确评价年轻人的观点，不理解他们的偏见，不认为自己没有必要苦口婆心地去抑制青年的激情，那就很难跟年轻人相处。不过，我们应当理解他们，要对他们有礼貌，富有同情心。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正当青春年少就幸灾乐祸地苛刻评论那些打过仗、挨过饿、战胜过颠覆的人。最好认真思考一下造成我们自负、任性和不满的原因。为什么我们常常对最亲近的人粗暴无礼，而未能给予他们应有的报答呢？

对于这种情况，西方往往用“冲突”这个词来解释，似乎两代人的代表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必隐讳，资本主义世界的确具有“青年反抗”的悠久传统，比如在60年代，相当一部分出身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环境优越的青年掀起了一个嘻皮士运动，而在本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使自己的政府受到比较严重的打击。真正的青年反抗表明（特别是在法国和西德），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并不象统治集团的报刊所竭力宣扬的那么巩固。80年代初，这些国家的青年又掀起了反抗的巨浪。青年人并不承认西方社会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有“坚实的价值与牢固的原则。”反对资产阶级习俗的倾向和所谓的“反文明”倾向又重新极其广泛地蔓延开来。这种人生观表现在许许多多的浪游之中：这些年轻人只需一点点起码的生活用品，有时独自一人，有时成群结队地试图为自己建立一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生活的绿洲”，而实际上，弥漫在这些所谓的“绿洲”上的，仍旧是资本主义的恶行：酗酒、吸

毒、淫乱和懒惰。

我们看到，在西方，青年与社会的“冲突”虽然没在根本上对社会政治结构发生影响，毕竟具有社会性。而且，也应当对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予以应有的评价，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承认“冲突”的社会基因。不过，问题在于，他们也以同样的尺度来对待我们的青年：照他们的说法，在共产主义类型的社会里，社会动乱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声明迫使我们认真地去观察那些间或对老一辈的事业表示不满的少男少女们。你们想必已经发现，我们一部分年轻人的物质需求特别发达：要求父母给他们买昂贵而又时髦的衣服以及高级电器等等。当然，这很可能是从小逐渐养成的。这种物质的飞跃可以用我们任何时候都应当予以注意的客观原因来解释。对此，伟大的俄罗斯生理学家美尼奇柯夫曾经说过：“婴儿想拿到他们看到的一切。他向月亮伸出手去，由于不能满足自己的愿望而感到伤心。在青年人那里，这种不协调并没有减弱。他们早在不能判断现象的实质情况时，就已形成自己对生活的要求；他们不明白，要实现所追求的东西，自己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因为意志是人发育得最晚的能力之一。”

理想与实际可能性的这种差异，大概可用来解释上面所谈到的我国青年身上的那些消极方面。

“这种差异会长期保持下去吗？”

“直到他在社会上立定脚跟；直到他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直到他能用心去体验、用头脑去理解人类的美。”

“不过到底要到什么年龄才算成熟呢？”

“不知道,也许是15岁,也许是50岁。”

英国作家詹姆士·奥德里兹讲了一个名叫斯密特小姐的故事。这个18岁的姑娘到大不列颠博物馆时抱定了一个宗旨——掌握人类的全部知识。很快她就认定自己的企图要落空。就这样过了大约40年,她连一本小书都没有读完。这个故事说明了青年人具有的、代表性的现实与理想、愿望与可能之间的冲突。象40年前死去的斯密特小姐一样,这种人带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死去了,逐渐被人们忘却……

可见,一切都取决于你们自己,取决于你们是否能够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进行斗争,是否能在必要时抛弃自己的爱好。为此,必须超脱它们,正确选择对社会有益的想法。在评论斯杰克洛夫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时,列宁高度评价了这位伟大的俄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倘若缺乏自觉从事公益事业的习惯,缺乏公民感,那么男孩长大之后,会长成一个中年男人,但他不会成为一个男子汉,至少不能成为一个具有高尚气质的男子汉。见解和兴趣的平庸会在性格和意志中表现出来:“见解有多大,决心就有多大。”

因此,我们的成长是跟能力与修养的加强密切相关的。可是,如何来检验我们是否已经成熟了呢?检验的标准又是什么呢?看来,还是应当无条件地赞同歌德的主张,他建议:在认识清楚你自己之前,得有所作为。

一个人怎样进行自我改造,美在何种程度上变成了他的内在价值,他能在何种程度上从审美理想的角度来审视自

己、评价自己的行动——这些大概就是检验自我的主要标准。

爱幼也有其历史渊源，每一代的年轻人都在劳动生产、科学文化方面从老一辈手中接过接力棒，因此，应当信任他们、关怀他们、谅解他们的心情。我们现在看一下列宁是如何对待年龄幼小的公民的。在国内战争的艰难岁月里，无产阶级的领袖特别关心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和食品供应。根据他的建议，1919年通过了向儿童免费提供食品的法令。十二军政治工作人员维士涅夫斯卡娅回忆说：“伊里奇在谈到必须象爱护眼珠一样爱护儿童时，表现出多么不寻常的热情。他说，儿童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财富。我记得，他挥了一下手似乎是为了强调自己的这一句话：‘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看到，列宁观察儿童问题时不仅仅是从国家的角度，而且也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一个能够被孩子们的简单游戏逗得欣喜若狂的人。列宁使用“幼年居民”这个词，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些幼芽特殊的独立性，他们的概念范围与兴趣爱好都与成年人大不相同。成年人表现的信任和关切在幼小的心灵中注入了对于未来的信念，那时候，美与善将成为人类幸福的必要条件。

罗辛的剧本《赶紧行善》谈的正是这个问题。一个小姑娘因亲生父母所逼，自寻短见，被一个成年人从火车轮子底下救了出来。小姑娘名叫奥丽娅，成年人叫米亚吉舍夫。奥丽娅为米亚吉舍夫的善举所感动，开始真正过起无忧无虑的儿童生活来。后来，由于感受到真诚关怀的温暖，她被冻僵

的心也渐渐融化了。

在列宁格勒科学院“列宁苏维埃”剧院上演的这个话剧中，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对于米亚吉舍夫来说，人道地对待奥丽娅这件事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培养人类高贵品质的学校。看来，在人类的天性中常常会产生一种关切别人、护卫别人的需要。恐怕会有人知道：我们如果将自己心灵的一小部分给予别人，就会使我们的的心灵更加充实，就会延长我们的精神生命。一般说来，别人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要学习孩子们常常使我们吃惊的直率，学习他们那种难得的正义感。你听他们的小嘴在说：“皇帝没有穿衣服。”——你们想必还记得这个丹麦童话吧？

有一位先哲说：“别厌恶合理的评判，即便它是年轻人说出来的，因为无比珍贵的珍珠，也并不因为它是年轻人从深渊里取出来的而贬值。”

现在书归正传。同成年人发生情绪激动的冲突，这是儿童心理活动的一种极早出现的现象：他们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天性的社交要求。这种情况甚至在吃奶的婴儿身上也可以看到：他们所喜欢的，并不只是喂他们吃喝和照料他们的人，还有那些跟他们谈话、逗他们玩的人。

几年前，美国女作家贝尔·考夫曼访问了我国。当时，《共青团真理报》的记者鲁登科问道：苏联留给她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老奶奶。”她回答。

“老奶奶？”

贝尔·考夫曼继续说道：

“看来，您还不明白……我说的是那些牵着孙子的老奶奶，——在街上，在公园里，在剧院，在展览馆，在运动场。在美国的街道上您是看不到这种情景的……”

我们的记者同一个澳大利亚女记者所谈的仍然是这个问题：

“……请你详细地对我解释一下，她们，我国的老奶奶，使你们激动的是什么？”

“无私，忠心，自我献身。简而言之，是对孙子的爱。”

“不过，奶奶和孙子是亲人啊，怎么能格外呢？”

“什么格外？并不存在亲不亲的问题。人疏远人——这就是我们那个社会的法则。”

社会法则，关于这个问题，美国报纸《格洛普》写道：

“美国有些地方，每两分钟有一个孩子要受父母责骂一次……美国正蔓延着虐待儿童的流行病……有两百万美国儿童被父母弄死。仅以纽约而言，每年被父母打死的儿童就在一百个以上。”

美国大多数学校中实行的体罚也是得到家长认可的。孩子们不愿欠债：他们又把教师打死。在学校大门口写的不是“欢迎”，而是：“严禁携带枪支、酒和麻醉品！”

在西德，作家别杰尔·肃特报道说，每年登记的虐待儿童案达30,000起，其中有600起造成了致命的后果。

这些虐待为什么在资本主义世界会有市场呢？

这位西德作家向我们提到的英格利特父女俩的对话回答

了这个问题：

“要是能这样，那就好了——世界形势变得更好，所有动父亲都有工作而且不再感到害怕。”

“害怕什么？”

“害怕房租涨价、生活费用上升。父亲们的恐惧会表现为对子女的虐待行为。要是父亲的状况不好，子女的状况也会很糟糕。我知道，有些象我这么大的孩子，就因为这样而自杀了。”

“的确是这样，西德每年就有五百多名孩子自愿选择了死亡。”

“我曾在美国匹兹堡的一所学校里上过学。这所学校里的一个小男孩向我讲述了他为什么想自尽的原因：父亲酗酒，母亲常常离家外出。于是我认识的这个小男孩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最好别活了。我还认识一个男孩，他的年纪比我大，他之所以要自杀，是因为中学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在美国，孩子到处受到迫害和凶杀。”

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实。现代科学无可争辩地证明，我们每个人的正常发展都取决于前人的经验，没有任何人的经验不曾帮助孩子们成为真正的人。那些被狼、熊和豹养大的孩子，他们染上了动物的癖性，因而不易接受人类的文明。他们很不幸，远远不象英国作家吉白林（1865—1936年）的幻想小说中所描写的毛格里那么诱人。

儿童在树立“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信念的家庭是生活条件的发源地。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个人生活，无论

是精神生活还是道德生活。如果人在童年时期就发现道德价值象被砍倒的树木一样没有生命力，那社会关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由于自身的对抗本质，资本主义不可能为建立人的正常关系创造条件，它所谓的道德与人道主义都是没有意义的。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保证不同年龄的人们之间的正常关系，尽管伦理准则要求我们尊老爱幼，但我们大家的权利是完全平等的。对于老年人，应当尊重他们的善良与诚恳；对于年轻人，应当教育他们做到善良与诚恳。

两代人的交往——这是经验与无经验的交往，是诗与散文、冰雪与烈焰的交往。重要的是，在这种交往中，每一个人都能够为别人着想，能够深刻地理解人的价值、尊严、追求和愿望，不仅是自己的同龄人的，还有其他年龄的人们。这是人类关系美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节 朋友与同志

我们每个人任何时候都希望有一个人，好向他诉说自己内心的想法，寄托自己的感情，分享自己的苦与乐、希望与失望。我们特别需要的是朋友与同志。“什么叫做朋友呢？”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爱尔维修回答了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朋友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亲人。我们之所以希望有朋友，是因为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没有朋友就活不下去，是为了以心换心，无话不谈，而这样的谈话因为充满信任，总是十

分令人神往。”友谊——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和基于观点一致的无私的互相尊重。在学术著作中，友谊的概念是跟人深刻的精神乐趣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乐趣能够揭示出人崇高的道德品质。在上述引证中，爱尔维修发展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思想。后者将友谊关系划分成三种类型：有益型、欢乐型和美德型。在原始社会，由于生活条件的限制，人们的关系局限于血亲范围内。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上述三种类型的友谊关系便产生了。“选择的亲人”是这样一种人，他跟自己建立更为牢固的关系；跟家庭成员不同，他是按照亚里斯多德表述的三个特征——有益、欢快和美德——来挑选的。辨别友谊的好坏，通常是考虑是否有益。这里不能把对友谊的这种理解仅仅归结为追求某种物质利益。“你为我 我为你”也可以涉及精神范畴。“她为了我所经历的种种患难而爱我，我为了她对我所抱的同情而爱她。”奥赛罗说。

我们看到，牢不可破的关系便是按照上述三个条件——有益、欢快、美德——建立起来的。仅仅基于有益的友谊只能保持一段时间，一到互相之间不再带来益处，人们的友谊也就随之而结束。

基于美德的友谊可以保持到互相之间不再有善意、体谅和仁爱为止。

友谊多半出现在个人关系网的范畴中，比如亲密的交往、共同的活动、一致的兴趣爱好等。

牢固的友谊由于互相帮助、互相理解、信任和好感而得

到加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真正的友谊这个概念是跟个人的某些要求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要求又与集体利益与同志关系有机地融为一体。因此，加里宁才把友谊称为一种最富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品质。许许多多人的兴趣融合为一种由若干心理、道德、审美和其他范畴构成的综合体，这种融合乃是审美理想的现实性、生命力和永不衰败的新鲜感的最鲜明的见证。

两个人之间的精神关系具有不可代替的价值。倘若破坏这种关系，人就会因为孤独而苦恼不堪。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吟得好：

当一个人孤独的时候，
可真是十分糟糕，
独自咀嚼着烦恼……

我们在从审美的角度来考察“友谊”这个概念的时候，应当把它看成是多种类型的友谊关系的协调一致。只有具有这种一致，友谊关系才会是美的。

友谊的“工艺流程”是怎样的呢？首先，我们从周围所有的人当中仔细地辨别出一两个人的行为，比较敏锐地感觉到他们的行动的“潜台词”的涵义，并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对于美丑的理解来考察这一切。他们身上的某种内在的东西吸引着，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受到他们精神世界的感染，从而将这个世界移入我们的心中。在此之后，我们已经不是我们了。我们的身上已经移入了另外一个人。他使我们更加充实，犹如阳春的甘霖使禾苗充满生机。列夫·托尔斯泰在意

识到自己跟别人的共同之处时写道，要是在他之前没有别人，那他岂能成为如今的样子？他是前人的作品，那些构成他的东西，在他之前有过，在他之后还会有。

那么，我们是什么人的“作品”呢？谁是我们的朋友和同志呢？你告诉我，谁是你的朋友，我就说你是谁。”一句谚语这样说。我们在竭力模仿同志和朋友、在跟他们交往的时候，也就同时在肯定自己。我们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愿望，想谈论自己，讲述自己的感情和心境。如果别人对我们的感情无动于衷，那就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距离，有时，往昔的知心话也会被我们用来制成对方精神上的创伤。不过，精神和感情的“协调”，总会带来交往的欢乐，促使我们进步，给予我们美的享受。

青春的友谊能提供集体生活不能代替的经验，形成精神交流必不可少的素养。无论是在社会生活还是在个人生活中，都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取代它，它是一所培养爱的学校。生活经验证实马卡连柯这一思想是正确的：年轻人如果不爱自己的父母、同志和朋友，就不可能爱自己的未婚妻和妻子。

如何才能了解别人呢？要具有哪些品质才能根据表情、姿态和声音去判断别人的幸福、爱情、恐惧、憎恨、反感和痛苦呢？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什么呢——是生活经验、聪明才智，还是命运、性格和气质的相似呢？

显然，每一个方面的相似以及上述其他各种因素都在友谊关系中共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如果相互之间没有

好感，缺乏谅解和充分的自我牺牲精神，根本就不会存在友谊关系。

所以，深切的好感、谅解与自我牺牲精神是朋友必不可少的伴侣。所有这些品质自身都带有一种基于美感的审美满足。

可以毫不夸大地肯定：一切英雄行为和一切具有社会意义的事业，都以其具有历史意义的壮丽和崇高的人道主义而使我们无比钦佩，它们都是由其爱与恨、朋友关系和同志关系、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而完成的。

真正的友谊能造成一种不利于个人主义、冷酷无情与悲观主义的气氛。在与其他人苦乐与共的无私关系中，表现出人类维护人性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与高尔基的友谊雄辩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它们以其高尚的感染力、无私的忠诚与无情的正直令我们深感敬佩。

马克思著作的某些出版商试图对他在共产主义新学说方面的贡献表示怀疑。恩格斯把马克思的名字放在自己名字的前面，无情地驳斥了这些企图。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忠于友谊与真理，在使马克思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学者的思想进一步普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看到，是互相间的好感、谅解和完全的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的物质联系、精神联系和知识联系，构成了他们友谊的基础。毫无疑问，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友谊气氛对于他们成为历史上无比完美的光辉典范起了促进作用，帮助他们创立了关于人类兄弟情谊的学说，而这——正是我们大家所追求的。

许多历史文献和文艺作品描述了列宁的朋友感情和同志感情。比如，马雅可夫斯基就曾写道：

他
对同志
亲切可爱，
充满人的温情。

对于列宁来说，克鲁普斯卡娅、捷尔仁斯基、斯维尔德洛夫不仅是政治斗争中的战友，而且是忠实的同志。

列宁与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为全民事业而进行的斗争中结成的友谊——这是一种伟大的典范：作为一个具有光辉理想的人，他与社会及其个别成员的关系极其和谐。我们大家应当以他为榜样。他在各个方面都堪为表率。这位领袖和导师对他人的关怀、精神上的温暖、主持正义等性格特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十分宝贵的。

列宁从不害怕那些激烈而又强硬的言词，特别是在朋友圈子中，因为他跟友人们所坚持的是同一个东西，它的名字就叫真理。他随时想从别人那里学到点什么。

列宁的伟大榜样提醒我们：那些对我们唯唯诺诺、害怕或者干脆不愿说反对话的人并不是我们的朋友。那些永远随声附和的人不可能给我们的精神世界带来益处，尽管应当承认，跟他们交往确实很舒服——有谁不乐于意识到自己是个完美无缺的人呢？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真理远非任何时候都是温暖柔和的。真理有时也是富有挑战性的，令人痛苦的。可是在人的交往中，真理越强烈，它就越能促进我们的

全面发展，而且永远不会贬低我们的尊严。因此，对自己和别人提出高要求，这乃是友谊和同志关系必不可少的条件。谁担心尖锐的批评会破坏同志关系，谁不善于倾听别人的批评，谁就应当认真思考千百年来人们的不断重复的一句名言：“柏拉图是我们的朋友，但真理更可贵。”纯真的友谊容不得妒嫉、仇视和勾心斗角。因为一个真正的人应当看到每个人的性格都由多种多样的色调构成，而不仅仅是黑白两个颜色。如果谁有什么事不顺畅，其他人就应当用言辞或行动去帮助他。你们如果这样互相补充，那么，每个人都能得到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所应具有的和諧和完美。

“同志”是一个伟大的词。它在平等与兄弟情谊的旗帜之下使分散的世界团结起来，使全体劳动者和我国各族人民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携手奋进。在小说《母亲》中，高尔基艺术地再现了这个进入觉悟了的革命者的语汇的过程：

……来的是一个活泼的、长着满头卷发的姑娘，她给安德烈送了一包东西来。她离去的时候，眼里流露出欢快的神色，她对符拉素娃说：

“再见了，同志！”

“再见！”母亲忍住笑，答道。

她送走姑娘之后，走到窗前，看着她的同志迈着细碎的步伐走在街上，象春天的花儿一样鲜艳，象蝴蝶一样的轻盈。

“同志！”当客人消失了之后，母亲说道，“你呀，亲爱

的！但愿你给自己找到个终身相依的忠实同志吧！”

“同志”这个词永远地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党和共青团的各种重要会议。它是否在随时提醒我们记住十月革命的成果：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实现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工人与科学家、集体农庄庄员与演员的平等。千百年沿用至今的“同志关系”这个词语具有丰富的涵义。“我想对您说……没有什么比同志关系更神圣！父亲爱自己的孩子，母亲爱自己的孩子，孩子更爱父亲和母亲。不过，兄弟们，这还不是那种关系：因为野兽也爱自己的孩子。只有人才能不因血缘关系、而因心灵相通亲如一家。”能够说这种话的不只是果戈里笔下的塔拉斯·布尔巴，还有参加卫国战争的红军战士以及当今的先进生产者。

同志关系这个词语能使兴趣不同、生活宗旨不同和个人品质不同的人们团结一致，使他们更加互相尊重，在别人困难时刻提供帮助，为别人承担责任，如果有必要，也提出自己的要求，表明自己的原则态度。

而且，由志同道合的人们组成的集体，其道德气氛对于确定未来劳动方案往往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在由富有同情心的、融洽的人们组成的集体中工作的人，是有圆满完成工作任务的最重要条件的，为了保护这样的人，你们甚至丢了乌纱帽也在所不惜。只要你们的集体是友好的，你们就不会撇下其中的任何一个成员于不顾。讲究道德、推心置腹——这便是友谊与同志关系的必要原则条件。

当然，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兄弟情

谊。奥德萨《共青团旗帜报》上发表了一封信，其作者是一个逃到国外去的苏联公民。他听了西方电台的广播，想到那里去寻找幸福。他在信里写道：“我总算被安置在一个交易所里，暂时有了工作。之所以说‘暂时’，是因为我全然不知道能干多久。在这里，每一家企业破产倒闭时，都会把许多人扔到大街上。比如现在，有一家铸钢厂倒闭了，有四千多人被扔了出来。什么东西都很贵，物价一天天往上涨。营私舞弊、行贿受贿比比皆是，泛滥成灾。头面人物们什么都弄走，谁的位置越重要，谁就弄得越多。这里有一座很大的设施——医院已经修建了好几年。承建这座建筑的头头们弄到几千万块钱之后，就溜之大吉了……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建立在彬彬有礼的谎言上面，人们一边撒谎，一边笑容满面。我所工作的那个交易所里充满的也正是这种气氛。我们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那块牌子前面，如果有什么地方弄不清楚，就宁肯在那里站一整天也不问一句话，因为要是问了就可能失去工作。这种日子跟在地狱里没有两样：随时随地都感到恐怖，无论是在工作中和人的关系中，还是在任何一件鸡毛算皮的小事上。在这里，谁也不在工作上互相帮助，每个人都守口如瓶，疑神疑鬼。其实，不仅交易所如此，到处都是这样。生活的风尚就是这样的。这里不存在我们所理解的‘集体’这个词。”

试想，既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迫人们接受人吃人的兽性原则，那么，哪里还谈得上什么集体不集体呢？

而社会主义则力求使人们的关系成为美的，使他们自己

因为意识到参与全民的事业而感到高兴万分。

如果集体里不存在团结一致，那它的成员之间也就不能有牢固的、自愿的与无私的关系。克雷洛夫说得好：

如果同志间不协调，
他们的事情就干不好，
干了半天无结果，
弄得人人都烦恼。

当我们在选择朋友和同志时不是凭他们实际的品质，而是凭衣冠，凭他们的“风度”，就会犯错误。因为衣冠和“风度”乍看之下往往会拔高一个人。

而朋友，真正的朋友加同志是在患难中结交的。

《共青团真理报》谈到过一个姑娘的遭遇：

……玛丽娜在毕业之前两个月被迫停学了——中枢神经系统出了毛病，语言能力急剧下降，视力大大减弱。顶多只能坐十分钟，没有人照料就不能吃东西。

同班的许多同学来看望她。其实，他们不来倒还好一些，因为这只会使她感觉到，在躺着的她与站着的同学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说什么坐不坐，无非是一句空话。

首先醒悟过来的是谢辽沙。在他的率领下，小伙子们在玛丽娜的窗前栽了六丛丁香花。接着又为她举办了一次音乐会。在这之后大家也没有让她孤零零地一个人躺在家里，要么按组、要么按人轮流来陪伴她。

几年之后，友谊收了效，这个患了不治之症的少女痊愈

了。他们翻着照片，一边笑，一边回忆几年来的种种情况。玛丽娜也跟他们一起笑，而且笑得比大家都开心。他们欢聚在李树下的桌子边，就象一家人在进餐一样。

朋友关系与同志关系不仅存在于年龄相近的人们之间。它们也可能存在于父子之间、师生之间。

柯尼亚才转到这个学校来念书，原校对他的鉴定不大好。现在他的班长也对老师说：“我算服他了。”老师明白隐藏在这句话后面的意思：柯尼亚来到新集体的第一天就打烂了一块窗玻璃。老师想请他的父母来，可是他们没有来。正象他母亲后来所说的：谁愿意听那些叫人不舒服的事情。

有一天，他母亲终于没有象往常一样从学校门口走过去。老师在这一天——星期一值班，找时间开放了学校陈列室，举办了学生劳作展览。他将柯尼亚的母亲请进陈列室，架子上显眼地摆着柯尼亚做的锤柄。

柯尼亚的母亲扬起头，信心越来越大地看着陈列室里的一切。她探询似地看了老师一眼，还笑了一笑。老师知道她平常很难得笑一回。因此，出于纯粹的人道，他开始可怜起这个孤独的女人来：她的欢乐竟这么轻易地流露出来了，还当着众人的面。他似乎在对她说：您看，您的希望不会落空，柯尼亚会出人头地的！只是还得再等一段时间！

当她留下来与老师单独交谈时，已经对获得不带鄙视意味的回答报有希望了。跟那些不大说话的人一样，她先干咳了几声，才问道：

“我家柯尼亚现在怎么样？”

才问了一句，她马上又感到不好意思，因为提问的语调不太得当。

“柯尼亚吗？”老师装做不明白她问的是谁，反问她。

“就是他。”

“是一个相当好的小伙子！他是我的好学生之一。而且他明天还会变得更好——我们这里的口号就跟你们工厂里的一样。”

“柯尼亚真是这样吗？”

幸好，此时母亲的眼睛被泪水蒙住了。否则她便会看到她儿子的样子：此时，他正睁大眼睛盯着自己的救星，几乎处于某种癫狂状态。

老师没有马上回答。老师的沉默大大出乎孩子的意料。

……当天夜里，柯尼亚一直睡不着觉。他想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只是从此之后变成了另一个人。成了老师的第一个助手，毕业时各方面都很不错。

若干年过去了，可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朋友——老师，还找他商量那些他甚至不同母亲和妻子商量的事情。

第四节 迎接自己的命运

缺少友谊与爱情，人的生活就会象一年缺少春天一样不圆满。

“青年时期的确是黄金时代啊！”满头银丝的女人们和男人们在回顾纯真友谊与忠诚爱情的时候，常常这样慨叹。在

真正受过良好教养、不曾被世俗观念败坏的青年男女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无耻、粗野、轻率和欺骗。

有一次，马卡连柯问道：“青年男女之间的正常关系应当是怎样的呢？”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回答说：“真诚，即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当他们不互相欺骗、当他们既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就是正常的，而不管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是朋友关系、恋爱关系，还是其他什么关系。一般说来，只要关心别人的生活和幸福，这样的关系就是美的。”

可见，照马卡连柯的看法，青年男女之间可能存在朋友关系和恋爱关系。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以纯洁和高尚情操为其特点，而这便意味着，它们都应以美为基础。

朋友关系——这正如上所述 是一种平等关系 青年男女互相表示善意，互相产生积极的影响。小伙子对姑娘的尊重——这比对弱者的尊重更为强烈。母亲、妇女和爱人的形象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受到歌颂。

语言大师们通过认真观察生活而表述出来的精辟见解，在这方面远远超过了科学家。比如，列夫·托尔斯泰在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中把爱情分成两种：“主动的爱情”与“美的爱情。”这位艺术大师写道：“……所谓主动的爱情，便是尽量满足爱人的一切欲望、要求、稀奇古怪的念头乃至恶劣的习性……”。“所谓美的爱情，乃是指爱情中，感情本身及其表现都是美的。对于这样去爱的人、恋爱对象十分亲切，能在他们心中激起一种美好的感觉，使

他们在意识和表现这种感觉时享受到充分的欢悦。用美的爱情去爱的人们……常常变换自己所爱的对象，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仅仅在于随时体验爱情的美妙感觉。”

斯汤达尔考察的则是爱情的另一种界限。他在将于连的爱与唐胡安的爱进行比较时，描绘了文学作品中这两个人物所具爱情的心理特征。斯汤达尔强调指出：“唐胡安感受到欲望的冲动，但却因为冷静的现实打算而不能得到充分满足，正如这伴随着虚荣、吝啬与其他欲望一样。他不是忘情于五彩缤纷的奇妙幻想中，而是象一位将军一样，思考着自己操练的成绩。概言之，他在毁灭爱情，而不是忘乎所以地享受它……”

相比之下于连的爱情更富于浪漫主义色彩，这种爱情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那样，是美的爱情。到处等待着它的都是失望。斯汤达尔说：“于连型的爱情揭示了一切艺术、一切甜蜜和浪漫印象的灵魂；揭示了月光、森林之美、绘画之美的灵魂——总而言之，揭示了一切美的感情以及享受这种感情的灵魂，而不管它表现为何种形式……”

或许，有人知道所有这一切的“纯粹形式”是很难见到的，尤其是在少年时期的爱情中，唐胡安式的爱情则根本就见不到。

要是我们说爱情，特别是主动的爱情源于友谊，那我们并没有违背真理。这一阶段可称为献殷勤——这个词是个不带褒贬含义的中性词。这个阶段也确实是介乎友谊与爱情的中间阶段。难怪有人看到一对青年男女在散步时，会痛苦地

断言：“他们交上了朋友，可是等他达到了目的，又会去跟另一个姑娘结婚。”异性间的友谊不只是在熟人和亲近的人当中引起怀疑。社会调查的结果也证实了这种情况。中学高年级的同学并不承认男女孩子之间有友谊；而成年人一般所称的朋友，要么是指男子汉，要么是指成年妇女。

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友谊会向爱情过渡，或者其本身就是爱情。爱情是人类关系中最强烈的感情。它或早或晚都必不可免地出现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因此我们“认识”它不仅要靠感情，而且要凭理智。在这里不妨指出，当今的爱情亦如其他任何一种感情一样，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逐渐变得高尚的，并且变成了崇高精神力量的取之不尽的源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到中世纪之前根本不可能谈到个人的性爱。肉体的美、亲密的关系、共同的爱好等等，会在异性间激起交往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不过，这还远远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爱情。一般说来，结了婚的男子羞于表露自己对妻子的感情。我们的爱情以及它培养起来的感情与一般的吸引，与古人的情欲，具有根本的差异。恩格斯把它的第一个突出特点称为相爱。

从中世纪的偏见中解放出来的妇女，在文艺复兴时期将爱情肯定为一种高尚感情，从而制定了新的道德法则：两性间没有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爱情。这该怎样来理解呢？要是我们把爱情称作是美的，那就是说，吸引着恋人们的并不仅仅是外貌的美。恋爱关系的建立还要考虑到我们称之为道德纯洁的东西以及爱抚、关切等等。我们之所以提及这些

相，是为了求得一致的见解。在文艺复兴时期，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人类各方面活动的深刻的质的变化业已成熟。从基督教的偏见中解放出来的妇女（“亚当的肋骨”）已经不甘屈服于不平等的男性。她们认为，自己的外貌美不应当带有沾污灵魂的东西。以后，内心世界的美逐渐在异性交往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它能够使肉体的美变得崇高。纯洁与诚实——唯有此二者能使一个少女变得更美、变得更善，从而在她心中激起真正的爱情。

当代爱情的第二特征，照恩格斯的说法，乃是其强烈性与持久性，而不能结合和离异，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极大的不幸。为了爱情，人们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这方面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

我们注意到，爱情是一种人皆有之的感情，无论对它下什么定义都必然会削足适履。不过，我们还是想勾画出这种感情的主要方面。

爱情，这是一种充满浪漫色彩，使人欢欣鼓舞的友谊，是一种被强烈的精神激情所美化的友谊。

爱情，这是一种神秘的内在动力，新的情绪状态、精神冲动、观点与兴趣的一致以及对于通过相互补充而实现完整的追求。正如我们在亲手制作的东西中看到自己一样，恋人们也在对方的身上看到自己，仅仅在他身上和通过他发现自身的价值。我们的幸福与痛苦，欢乐和忧愁，满足和失望——这一切都应与人分享，只要他看见、听到和予以评论。人的天性就是如此——在别人的身上寻求自身的价值。温柔

是爱情的基础。法国诗人和美学家布瓦洛说：“温柔可能根植于尊重的长河中，倾心的长河中与善意的长河中。要在尊重的长河中做到温柔，就得首先进入恋爱的村庄……”

爱情是力量与创造的丰富源泉，它使人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牢固。

马雅可夫斯基为它吟诵了这样的诗句：

爱——

这便是摆脱

愚昧

与无尽的失眠，

妒嫉哥白尼，

把他——

而不是把圣母的丈夫

当作自己的情敌。

爱情跟友谊一样，是自由选择的。尽管这是两个人的事情，但局外人的帮助并不显得多余。这样的帮助可以来自父母、老同学和文艺作品。艺术将爱情推举到道德意识与审美享受的顶峰。它展示出，知心的柔情、道德的纯洁是多么美，人道是多么坚不可摧。新世界的建设者理应得到与自己的不朽事业相称的高尚爱情。

苏联诗人施巴乔夫写道：

我们建设着共产主义，

世上有什么比这更壮丽？

有什么比这更艰苦？

何处是尽头？无边又无际！

凭谁说——

我们的事业虽宏伟，

爱情却渺小不能及？

然而，对于艺术中展现的爱情，应当以特殊的方式去认识，要考虑到艺术家总的构思及其主导思想。在列宁格勒，一些社会学家对一组少女进行了调查。调查表上所列的许多问题中有这么一个：“您是否愿意嫁给象电影《救火》中的巴什基尔泽夫这样的人？”结果绝大多数被调查者作了否定的回答。显然，这些社会学家在进行调查时没有考虑艺术的特点，生搬硬套地把艺术的真理拉进生活中、拉进人们不愿公开的私房话题中来，结果使得我们最优秀的电影艺术形象之一不受欢迎。

我们的报刊上常常有人呼吁：艺术要为青年着想，艺术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应当经过认真筛选，使之富有教益，只涉及正面的道德范畴。

在这方面，我们想起了电影《洁净的天空》的导演邱赫莱的主张。有一群姑娘写信给他说：

“敬爱的导演同志，我们苏联的艺术应当在苏联人民心中培养高尚的意识和道德情操，可是您的影片给我们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榜样呢？您向我们展示：您的女主角在跟飞行员阿斯塔霍夫认识的第四天就把他领进自己家里，与他过夜……难道苏联少女的表现都是如此吗？”

导演在回答时反问道：

“那又怎样了？要是第四天就跟自己的爱人过夜有失体面，那要到第几天才不失体面呢？”

在这个问题上，姑娘们没有注意到：这个飞行员是女主角的爱人，以后她一直忠于他。

我们还是忍不住再让大家看一封信：

“我是一个教文学的女教师，我竭尽终身之力向学生们灌输一种思想：一见钟情是愚蠢的，必须先了解清楚一个人，然后才能去爱他。可是，我们费尽心血培养起来的信念，却往往毁于一旦……”

邱赫莱也不赞同这种观点。要知道，普希金《叶甫格尼·奥列金》中的塔吉亚娜·拉琳娜爱上奥列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贝娜爱上皮却林，都是一见钟情啊。

我们支持邱赫莱导演的观点。他不仅有理有据地回答了他的反对者，而且回答了那些把文艺作品当成道德法典和理发价目表的人。可见，不能在反映生活的镜子——艺术中去寻求实在的东西。

艺术能在心理情绪范畴中创造新的东西，也就是说，创造理想的东西。艺术的东西是一种审美过程，其本身并不能改变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但却能预示这种改变。一般说来，艺术的东西能够形成理想，因为艺术毕竟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实现（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改造。

列宁既鄙弃小市民的伪善，又痛斥资产阶级的堕落。他在隶属于感情的人类关系的各个范畴中表明了自己高度人道的观点：共产主义不应实行禁欲主义，而应是使人享受人生乐

趣，精神焕发，乃至唤起美满的爱情。然而，列宁也注意到，倘若性生活过度，无论对谁都没有好处。列宁尖锐地抨击了资产阶级的“杯水主义”。按照这种理论，似乎到共产主义之后，人们就可以象喝一杯水那么轻率地去满足自己的性要求。

那些寻求婚前欢悦的人，即便不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也常常为此而饮恨终身。一般说来，很难期待他们婚后的生活会有美，会有父母的尊严。

苏联人民演员乌日薇写道：“看到那些在大街上游逛的少男少女，我心里就感到不舒服。他们想提前当大人，十六七岁便急着去认识他们本该年岁大一些才去认识的生活。我可怜这些少男少女，他们自暴自弃，不能真正体验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年华。要是你看到那些年轻人招摇过市、放肆调情、甚至干出那种类似于夫妇欢悦的丑事，一定会感到伤心。为什么这些人对自己、对周围的人会如此厚颜无耻呢？”

我们应当同意这种看法：人类自古以来就知道既有有真正价值的东西，也有许多赝品。现在，这些赝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而爱情本身也发生了变化。比如在捷克斯洛伐克，约有一千名少女回答了这么一个问题：她们希望未来的丈夫作为生活伴侣要具有哪些品质。结果，文化修养占第一位，诚恳占第二位，其后按顺序是：冷静、善良、忠实、幽默感、关切亲人……

……国立维尔纽斯大学的学生们也把文化教养摆在第一位。第二位是：对待妇女的态度犹如对待具有平等权利的朋

友；第三位：关心家庭和孩子；其后是精神充实与慷慨，理智，自信，爱劳动，冷静，幽默感，追求全面发展，形体美。

总之，摆在首位的是文化教养。对于小伙子们，要求的不是过去在选择中起决定作用的体力，而是文化教养。然而，在青年人的观念中，文化教养看来不仅包括有修养、高尚的审美趣味和感情细腻，而且包括体格的发展。小伙子必须有小伙子的样子，而不能是软弱无力的可怜虫。

那么，对于少女有什么要求呢？

对于少女，要求她们善于理解自己的男友；而对于妻子，则要求她们会料理家务。当然，除此之外，还须有女人气质。而女人气质首先是指对于美的追求——一个古代的哲人说：倘若您能找出一个不想变得美的女人来给我看，那我就说，这根本不是个女人。还有魅力。伊涅莎·阿尔曼特对自己的女儿伊涅说：“女人气质与温柔之中便有魅力。”

忠贞不仅伴随着爱情，而且是爱情的先决条件。平等也是如此。少女如果意识到自己是与少年平等的，就会更主动、更自由地去选择符合道德的行为。然而，矜持、自重与谦逊，正如在普希金笔下的塔吉亚娜身上一样，乃是少女最优美的品质。

天然的美也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我们不妨回想一下莎士比亚的第一百三十首十四行诗：

她的眼睛哪里象星辰，
红珊瑚也远胜她的朱唇，

她裸露的肩臂并非雪白，
满头黑发犹如纷乱的铁丝。
大马士革的玫瑰白里透红，
她的双颊哪能同玫瑰相比。
她身上散发的气息无非如此而已，
紫罗兰的清香更加令人陶醉。
你在她身上找不到一条完美的线条，
她额头上也不焕发特异的荣光。
我不知道女神如何在天庭徜徉，
只看见我爱人行走在地上。
可她较之那些美人儿毫不逊色，
尽管她们被瞎吹为国色天香。

青年男女之间的平等体现在何处呢？体现在他们的共同事业中。也体现在有权自由进入能够驰骋自己才能的广阔天地。

的确，在最近一段时间，有些青年人将平等和自由理解得十分奇特。既然小伙子们抽烟，那姑娘们为何不能抽？因为要讲绝对平等啊，或者象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要讲解放啊……

最初，抽烟似乎是一种美的现象。其中可以找到某些富有审美吸引力的地方：嘴里叼着一支烟，使人觉得你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具有高深莫测的天才。

后来，抽烟成了不良习惯，会严重危害身体，但还是能我到令人快慰的理由来抽烟：“某个名人抽烟吗？他当然抽

烟。”等到双手熏得焦黄，抽烟的人经常咳嗽的时候，他也会痛心地自我解嘲：“不抽烟、不喝酒，精精神神往地狱走。”

在这种痛心的打趣中，的确也包含着若干真理。抽烟是肝癌的主要原因，会导致各种心血管疾病，造成婴儿先天的缺陷，引起消化道溃疡，严重降低工作效率。每抽一支烟要缩短十五分钟生命。你们好好考虑一下这个数字吧！

酗酒的害处更大。经常酗酒的人脾气暴躁，情绪极不稳定，在同龄人中爱充老大，总想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在这种时候往往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和可能（“酒疯子天不怕地不怕”）使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受到破坏。在日常生活中，有90%到95%的违法行为是由酗酒引起的。酒精是一种催化剂，能促使反社会的观点和利己主义的追求在某些人的意识和行为中表现出来。

酗酒往往源于不善交际。这种情况并非偶然：两三杯酒下肚之后就会提出这个尽人皆知的问题：“你看得起我吗？”而不善交际又是修养的结果。是的，一个人可能是个大专家，可他的一般修养却会很差，因此，他在交谈中总找不到“接触点”。正如调查材料所表明的那样文化程度越高越不贪杯。在接受调查的人当中，有半数的酗酒者还没读完七年级，有77%的人没有达到起码的文化水平。这些人一般不善于计划安排自己的业余时间，成天泡在酒友当中。

酒鬼丈夫不是我们所公认的涵义上的丈夫。我们打算描绘酒鬼的尊容，你们大概已经看见过他们的样子：凹陷的

铁青眼皮，无神的眼睛。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脸很丑。要是哪个姑娘爱喝酒，那她还有什么美可言呢？

酗酒能够削弱自己的意志，会使人由于抑制过度而使自己失去控制。少女们正是在喝酒之后容易一时冲动与人发生性关系，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伊凡诺夫省22岁的瓦列里在写给《共青团真理报》的信中说：“难道真的没有敢于维护贵妇人名誉的骑士了吗？可是他们应该去维护谁呢？如果妇女在过去被认为是美的女性气质的理想，那么现在则很难见到不抽烟的姑娘，更不要说喝酒了。”抽烟喝酒的人数的确是在迅速增加，相当多的年轻人都是如此，不过反应也是够强烈的。对一个少女来说，没有什么比说她不是女人更尖锐的指责了！

我们不能把平权和平等看成是在两性间实行平均主义。在谈到社会上的平等时，我们无权忘记生理上的不平等和天性本身所决定的不平等。逾越天性规律的界限，就意味着不是发展千百年来所创造的美，而是失去这种美。

年轻人不仅应当善于识别美，而且应当善于识别丑。人类的美既是通过善，也是在战胜恶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医学资料和统计资料表明，酒精和烟草会缩短和败坏自然、社会和艺术中最珍贵、最美的东西——人的生命。

……你们且听塔吉克古诗人海扬是怎么唱的吧：

我清醒地去寻求欢乐与美酒，
看见一朵死去的玫瑰黝黑干枯。

“啊，不幸的美人儿，你犯了什么罪过？”

“我过分饮酒 过分纵欲。”

苏联大多数青少年都怀有美好的思想、光辉的理想和崇高的任务。

青年男女们迎面走来，手牵着手，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进，正如天性、社会和思想所嘱咐他们的那样。

第三章 人性要穿美的衣裳

第一节 不能不美

交际问题从来都是一个令人激动的问题，在我们今天，它表现得尤为突出。科学技术解决了人类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其中包括交际问题，但同时又变成了人类互相联系中的障碍。苏联著名剧作家罗卓夫说：“遗憾的是，正是在科技革命时代，当在许许多多密切人类交往的福利之中又增添了喷气式飞机、长途电话和电报的时候，却又涌现出人与人之间不相往来的潮流。”

我们打算从各个方面来考察交际问题，好使读者易于在生活中找到人类相互交往的美。

交际——这是为了“架设”人与人之间的“桥梁”而进行的精神活动。交际艺术是意识活动的外部形式，它本身凝聚着生产活动、智力活动与情感艺术活动。

无意识的活动——偶然性或者习惯、某人的直接影响、生理因素等等，既可以对一个人的社会面貌产生积极影响，也可以产生消极影响。

美的交际的奥秘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中。既然

人的精神世界是广袤无际的，那么交际的方式也就没有穷尽。然而，这并不是说，其中没有共同的规律可循。“以心换心”与内在视觉能力乃是各种类型的交际（事务交际、心灵交际等）的基础。换句话说，交际的天才在于理解别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体谅别人的心情。主动分享别人的幸福和不幸，关心别人的命运，帮助别人，对待别人的生活象对待自己的一样。这是人类认识中最敏感的范畴之一，它所认识的不是思想，而是别人的感情和心情，“把别人的感情当成自己的（席勒）——这一发现是对待别人的正确的、唯一可信的立场。一个易与别人产生共鸣的人，一般说来是富有同情心的、敏感的、会关心人的人，他能将自己的内心感受表现出来。可是，怎样才能在他他人身上找到“核心”呢？再说，可以“捕捉”到他那象神奇的变色龙一样不断变幻的东西吗？事实上，在生产班组集体里，在大学生圈子里和其他地方，你们的某个朋友会被公认为是成熟的，严肃的，聪明的，有权威的，天才的，有专长的，可是在家里，他表现出来的却是另一些品质：他应当是个孩子，儿子，助手，要温顺，多情。要是他扮演不好其中的某个角色，那就会发生冲突。一般说来，我们的威信在于认清伴侣的作用或者强迫他去适应为这个角色提供的环境。

交际美最鲜明地表现在劳动的创造性中。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充分确定自己跟其他人的关系。然而，真正的交际艺术并不仅仅局限于劳动的创造性，它还应当具有富于吸引人的、美的智力。古人说得好：“世上唯一的华美乃是交际的

华美。”

智力的发展状况直接取决于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是采取接收形式还是封闭形式。正如波浪冲击着河岸一样，别人的生活也冲击着我们——不可能互不相干。我们——这是通过我们的意识的别人，我们是周围的人的“作品”，而“别人”也就是“我”。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如同茹柯夫斯基说：“我的一切几乎全是别人的，而这一切，又确然是我的。”

十分突出的是，在美的交际过程中，理解能力会特别强，记忆会特别好，思维会变得更为活跃。这是合符规律的：智力发展与交际过程中获得的精神舒畅是密不可分的。设想一下，如果你们中学毕业以后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去参加一项极其艰难的建设。就知识和智力而言，你们并不比班组里的任何一个小伙子差；凭智慧，你们知道他们的优点和弱点。可是凭心而论，你们远远不理解他们的追求和体验。最主要的，是你们还没有形成象他们那样的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不会理解你们。于是你们就会这也见不惯，那也不顺心，每天都想从工地上溜走，还会发生冲突，为一点点小事就发火。

凡是根本不理解别人的人，凡是不掌握最复杂的艺术——成为别人的艺术的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说来，这样的人不仅不可能成为朋友和爱人，而且难于在一台机床前共事，难于一起下班回家。不相往来会使人们部分绝缘，使他们的精神变得冷漠，因为这种人往往鼠目寸光，而且是自己情愿如此。

所以，交际——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不仅别人，我们自己也应释放出脉冲，使相互之间的关系保持温暖。只有遵循这一条件，一个人才可能对别人产生良好影响，无论是在感情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你们的确应该考虑一下：为了使你们身边的人更好，你们个人得做些什么呢？我们能否做到对他们说一声“早上好”，就使他们整天想到我们的笑容，感到我们的问候象音乐那么悦耳呢？我们能否与别人说知心话、能否分担别人的不幸呢？要是有谁在电车上踩着了你们的脚又不道歉，怎样才能既不大吵大闹，又使那犯了过失的人感到羞愧呢？

每一个即将踏入生活的人，都应当解决这些以及类似的问题。

可见，对于每个生理正常的人来说，问题不仅在于是否交往，而且在于如何交往。

要懂得交际文明，看来得首先弄清楚交际的品质方面：选择最合理的形式，有意识地接受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法规。

在“交际艺术”这个概念中，我们注入的涵义是什么呢？交际艺术是否象我们所确定的那些传统艺术种类（戏剧、绘画等等）一样，也是一种反映客观现实的专门形式呢？换句话说，能否把“交际艺术”跟“语言艺术”、“素描艺术”、“舞蹈艺术”的艺术等量齐观呢？

我们在把交际称为艺术的时候，指的是那种具有艺术作品中高尚榜样的特色的交际，它跟任何冒牌货和仿制品毫无

关系。掌握交际艺术的人是令人感兴趣的，正如天才的艺术作品一样。他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因为表述的见解新颖、不落陈套；行为的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忠诚老实，坚信语言不能脱离实际。

交际能力与艺术能力、审美能力的吻合令人惊诧不已。无论是在直接的人际交往中，在人与人之间开始形成只有他们才理解的某种情势因素的时候，还是在跟艺术交往——比如说，在独自欣赏一幅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所领会到的都不一样。同时，人也跟艺术品一样，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其中的意义只有善于产生共鸣的人才能弄清楚。

在我们所谈的这一方面，回想一下高尔基在创作中篇小说《奥古洛夫镇》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件事，想必不会没有意思。有一天，安德烈耶娃突然听见隔壁的屋子里轰响了一声。她在回忆中写道：“我进去之后发现，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直挺挺地躺在写字台旁边的地板上，两手僵硬地伸向两边。我解开他的衬衣，撕开他的绸背心，以便盖上压布进行急救。这时我看到：他右边的乳头下面有一条粉红色的斑痕……我直到后来才知道，他对这个女人（即小说中那个遭嫉妒的丈夫痛打的女人）的伤痕以及它的痛感想象得如此鲜明，以至他自己身上也出现了这条迹印。我记得，它还保持了好几天。我们请医生来给他看过之后，医生对我们说，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神经质的、易动感情的人身上。

易动感情的人不仅是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作家固然能够洞察人类天性的底蕴，然而任何一个人，无论他们

从事什么职业，也都能够了解亲近的人的痛苦；我们上面所举的，可以说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交际不单是在那种病态的情况下形成的。

在当代科技革命发展的条件下，倘若没有跟大自然的正常交往，交际艺术就是不可思议的。

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联环节，大自然是这样一种音义；它既能产生高度的人道主义和文明水平，也能产生美的概念。

问题在于，必须改造某些青年的意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事物和现象的天然属性本身并不能保证对他们具有审美关系。

这些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并不美。他们会折断树木，拆毁鸟巢，捣坏蚂蚁窝，弄熄林中空地上的篝火。这些人会干出许许多多的蠢事，因为他们完全丧失了那种感情：只有它才能够提醒我们处理好“可能”和“必要”之间的合理关系。

所以，在进行教育工作的同时，我国还采取了许多法律措施。苏联宪法和现行法律详细规定了公民保护自然的职责。

我们坐在中学的板凳上就应该认识到：大自然是我们存在的生态环境，它不仅是生命活动的源泉，而且其本身就是美，归根结底还决定了人自身的美。大自然也跟人一样：

……有灵魂，有自由，

有爱情，有语言。（邱特切夫）

与自然交往、与人交往的能力首先取决于愿望，取决于

探索自然与人的奥秘的不可遏止的追求。我们每个人都应相信，交际会使我们变得更美好。我们应当随时在人们当中寻求美好的东西。寻求的过程会在我们心中激起战胜一切的爱，真诚的温情与眷恋。

车尔尼雪夫斯基彻底考察过人类交际艺术中的美。他强调指出：“美在人的心中所激起的感受是一种明朗的欢乐，就跟我们的爱人在身边时我们心中充满的欢乐一样。我们无私地爱美，我们欣赏它，为它感到欢乐，犹如为我们的爱人感到欢乐一样。由此可见，美的当中存在着某种可爱的、为我的心所珍惜的东西。”

在这方面，我们应当记住：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人是可爱的：我们在他们身边时，能使他们感到愉快。

第二节 交际的表现形式

我们在考察外在文明和内在文明的时候，得出这样的结论：内在文明是形成外在文明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外在文明也会对内在文明的形成产生影响，而且毫无疑问是人与人交往时思想、心情和好感的重要标志。别林斯基说：整洁的外观和优雅的风度应当是内心的纯洁和美的表现。

对那些文化和审美修养贫乏的人来说，即便是优美的品质也会向对立面转化。的确，语调姿态、遣词用句、观点，也能向即便是陌生人的我们提供基本的信息：这个人是否正派？是否沉着冷静、讲究礼貌？尽管他们也知道，表面现象

带有欺骗性，可是人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归根结底是根据他所作的事和他的表现，基本信息毕竟不是那么易于克服的。最初的印象要么会成为心理上的桥梁，要么会变成障碍，而此后的关系便是建立在这些桥梁和障碍上面的。

或许，契诃夫的一段话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现实意义。这段话曾被卓娅抄录进自己的笔记本，也曾被一代又一代的人反复引用：“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无论是面孔、衣裳，还是心灵和思想。”

当然，不能将这片面地理解成：对人们不加选择地一概欢迎，对那些道德上有问题的人也毕恭毕敬。要是你们不睬睬那些卑鄙下流、信口雌黄之徒的阿谀奉承，不宽恕那些妨碍大家去完成工作任务的人和侮辱教师的人（遗憾的是这些现象至今仍有），那么你们的行为就是美的。

人类交际的表现形式，可以说指的就是外在的文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姿态、语调、表情是同内在感情的好与坏、舒畅与抑郁相一致的。正如一本打开的书一样，它们使我们的行为乃至我们本身所产生的印象具有“可读性”。只有当内心世界日积月累地“凝结”在人的外部之后，那时才谈得上外貌美。

雕塑家柯宁科夫搜集了契诃夫一生中各个年岁的照片之后十分惊奇：随着年月的流逝，这位伟大的作家面容的变化竟是如此之大。如果对人们一生中各个时期的样子进行考察，就会发现，精神活动将会导致脸型本身的变化。而谈论我们的面容，就如同谈论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性格和爱好。

或许正因为如此，古代的圣贤才有根据按照人脸解剖结构的某些特征，判断人们的优点和缺点。人的面容的变化也会受下述情况的影响：欢乐，突然遭致的痛苦，愤怒和烦恼。达·芬奇指出，哭的原因不同，眉毛的形状也会随之而产生相应的变化。笑容和眼睛的表情也各不相同：列夫·托尔斯泰描绘了八十五种眼睛的表情和九十七种笑容。当然，眼睛的表情，某种口形、眉毛的形状等等虽然取决于内心的状态，但毕竟可以而且应当通过面部肌肉来予以控制。

有一次，本书作者参加了顿涅茨省一所学校举办的问答晚会。有两个姑娘在晚会开始后五分钟才来。她们走进还没坐满人的大厅时，感到很不自然，满脸通红；莫名其妙地挤眉弄眼，脸上的表情变化得异常迅速。在进行辩论时，我在讲台边问，是否有人对他们说过：用力皱眉头、大声吸鼻子、咬嘴唇、伸舌头是不美的呢？到会的400个学生异口同声地回答：无论是在幼儿园和学校，还是在家里和街上，都没有听到谈论这些事情。报刊上读不到，戏剧、电影里也看不到。遗憾的是，无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未能对面容问题予以应有的重视。一方面，据说这是因为大声擤鼻子之类的小事不值得加以重视，而另一方面，既然尽人皆知不得如此，何必再来啰嗦。对这两种看法，我们都不敢苟同，只好请读者诸君自己去观察一下：挤眉弄眼会使面容失去哪些美。那时，你们就会得出结论：除此之外，那些早就知道的看起来十分简单的东西，其实颇为复杂。

面容不应当是死板的，不能掩饰自己的思想感情，而有

时装鬼脸（扬眉头、眯眼睛、张大嘴巴、动鼻子等），则会使人感到不舒服。

长得漂亮和身体健康的人的面容是开朗的、和蔼可亲的，眼里会流露出对我们的良好意愿。

作家和画家对人类灵魂了若指掌。尼古拉·查波洛茨基观赏了罗柯托夫所画的斯特鲁斯卡娅的肖像之后，赞美道：

喜爱绘画吧，诗人们！

唯有它能表现

变化无常的心的特征，

并将这特征移在画面上固定。

作家的职业也要求他们通过似乎无关紧要的细节——眼睛的表情、一声冷笑等，表现争战的场面、辩论的对象和微妙的处境。卡萨盖维奇为了在《星》这部小说中描绘一个脾气暴躁的老婆婆的样子，曾经尝试过几个方案。照留在她家里过夜的一个侦察员的说法，她是一个“土匪老娘”。而根据作家的解释，这个老太婆的确有一个儿子当土匪，但她的另一个儿子却是红军游击队员。因此，一方面，她的眼里对特拉符金中尉及其战士们射出凶狠的目光，另一方面她又显得殷勤好客。

一个人的姿势和动作能从多方面反映他的内心世界。是激动还是冷漠，是精力充沛还是软弱无力，是爱还是恨！狄更斯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一个人最微不足道的动作，比如在摘花或弄死某种植物时手的动作等，能帮助我们捕捉性格中的凶狠与普良因素。长篇小说《小杜丽》中的一个人物之所

以判断另一个人凶狠粗野，根据的就是后者用鞋后跟去扒石头，又用鞋尖把它踢到河里去——这样的人也会在路上冷酷无情地把自己的同伴扔掉。

动作常常是某些不良习惯的反映。比如交谈时摸对方衣服上的扣子，或者用钢笔，表链或者拳头去擦鼻子、眼睛，或者摸脸，或者搔痒，或者抹头发，或者擤鼻涕等等。

动作对于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含义。比如说，我们认为点头是表示肯定，可在保加利亚却恰好相反。因此，我们在学习本国语言和外语时应特别注意：动作在交谈中具有什么含义。

在日常交往中，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往往互相用手势来打招呼。这是同样存在约定的规律。如果遇到跟你们年龄相仿的人，可以把手举到跟头一样高——这就是表示欢迎。倘若遇到姑娘和年纪比你大的熟人，就以鞠躬致意为好。隔着大街或者较远的距离大声呼喊——即便你说的是表示欢迎的最美好的词语；或者与人交谈时嘴里叼着香烟，两手插在衣袋里，都会被认为是失礼的行为。

交际文明在许多时候取决于语言文明，因为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能调节人的行为，激发美的情绪。照列宁的定义，语言是一种极其重要的人类交际手段。

当你劝一个同志“你读一读司汤达的《红与黑》吧”时，无论目的如何，你已将自己与这位同志的关系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而当你说“再见”时，则已表明你对这次会见十分满意，并期待着尽快见面。我们与他人交际关系的形成

取决于许多情况，其中首先是我们的智力发育情况，相互间是否有好感等。因此，我们不仅被动地反映世界，而且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对它的态度。

由于天生的秉赋和艰苦的努力，每个人无论是对于日常生活语言、事业语言，还是对于文学——理论语言和艺术语言，都可能获得熟练的艺术。这门艺术首先取决于思想的内涵、深度，语言的丰富以及发现各种事物典型特征的能力。换句话说，语言是内在文明的一种最有说服力的标志。

近来，大学里的青年学生和大城市的高中生爱南腔北调地使用 *label* 和 *button*（商标和扣子）*watch* 和 *bag*（手表和书包）*father* 和 *evening party*（父亲和晚会）等英文单词，它们不仅无论如何也不会使语言变得美一些，而只会表明自己脱离社会，表明自己既不尊重祖国语言，也不尊重英语。

在每种社会、每个民族的青年人当中，都会流行着一些颇富特色的隐语。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因为这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除了其中的各种因素之外，它反映出青年人有意以自己的形象化语言与成年人千篇一律的话语相对立的趋向。诗人叶·维诺古罗夫在《文学报》上谈到：他的一个朋友准备到某处去，急急忙忙地给他挂了一个电话。于是他反问道：“你怎么啦、又要溜到哪儿去吗？”这样的提问包含着幽默、好感和表现力，能使相互间的关系变得更亲切，使情况带有一种友好的色彩，变得更加具体。于是打起电话来就会无拘无束。

所以，隐语并不是不可以用，只要将它们融入活的语言组织之中，而又不逾越俄罗斯文学语言公认规范的美的范畴。

语言是一种民族财富和文化珍品。珍惜这一财富、培养自己高度的语言文明，乃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语言文明就是要善于准确而又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捍卫语言的纯洁性、涵义的准确性和敏锐性的斗争，乃是捍卫文明武器的斗争。”高尔基写道。“这个武器越锐利，方向性越明确，它就越能所向无敌。”

如果把有关语言的全部言论搜集起来，可以编成厚厚的一本富有教益的书。这里且列举一些有关人类语言修养的名言：

你开口吧，好让我看见你（苏格拉底）。

大丈夫隐藏在自己的舌头下面（阿里）。

话语出自真心，方能打动人心（尼扎米）。

语言表达能力低，从来都是文化修养差的标志，而且永远都伴随着思想修养差（鲍斯托夫斯基）。

一个人的语言文明乃是他精神文明的镜子。祖国词汇的美与伟大，这是对儿童发生影响，使他的感情、精神、思想和感受变得高尚的极其重要的手段（苏洪林斯基）。

再看几句民间谚语：

话语不是麻雀，飞走就抓不着（俄罗斯）。

空桶格外响（乌克兰）。

说出来的话有一半是属于别人的（哈萨克）。

吹得要建几座城，实际不值一分文（亚美尼亚）。

早在古罗马时期，西塞罗便对语言制定了一些要求。这些要求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照这位古代圣哲的看法，最优秀的演说家要能用自己的语言使听众受到教益，感到欢快，并在他们心中留下强烈的印象。

西塞罗强调，思想应当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巧妙而又富有教益”而语言则需“从容动听”。语言的优点在于纯正、明白、遣词准确，节奏和谐。有两种因素美化谈话，这便是“悦人的词语与悦人的节奏”。词语是材料，而节奏则是它的装饰。

要想说得正确，说得漂亮，就应当丰富自己的词汇储备。要在谈话中作必要的强调，恰到好处地运用名言、成语和谚语。这就必须阅读文艺作品，收听广播。而最主要的，是要维护语言和思想的纯正。

要同各种“语言垃圾”进行斗争。要尽量避免使用粗俗字眼。布·季莫菲耶夫在《我们讲得对吗》一书中向我们介绍了两个大学生的对话：

“喂，怎么？”

“杀了四个球。”

“真棒！我可崩了。踢马刺也没用！”

很难有人会猜到他们谈的是考试成绩。当然，更不能使用粗话脏话。

有一篇文学作品里写了这么一个故事。职业学校的两个男孩着手去帮助一个成年人克服爱讲脏话的不良习惯。这个

成年人是暂时派来教他们进行生产实习的。孩子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每当师傅说一句脏话，他们两人中的一个就说：

“要是我没弄错，我们最最敬爱的康士坦丁·米哈依洛维奇老师，您大概是想叫我们把灰浆桶往施工的地方挪一挪……”

“你说得完全正确，第二个男孩跟着说道：“我个人也是这样来把我们善良而英明的老师的深奥隐语翻译成普通的俄语的。”

在整整一个月当中，孩子们就这样弄得师傅无可奈何。他想发火，可又挑不到碴儿，最后弄得整个工地都开起他的玩笑来……而笑声，我们知道，乃是一种可怕的武器。

有时，中小学生在当中也存在讲脏话的现象。这不只是说明他们的语言不文明，而且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也是一种流氓行为。在与女性交往时更须戒除隐语。

话要说得简单明了。如果对交谈的东西不了解，那就要不要吭声。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说：“你最好沉默，倘若比沉默更好，那你就开口。”

要讲真话。重要的不仅是谈话的内容，还有谈话的方式。说“是”的方式有50种，说“不”的方式也有50种，但这只能用其中的一种来写——萧伯纳这么说。

是的，同样的意思，同样的词，可以有不同的说法……

中世纪东方有一位著名的国王。有一天，他梦见自己嘴里的牙齿全都掉光了。第一个详梦的人说：“你的全部亲属都

要在你之前死去，一个也不剩。”第二个详梦的人比较聪明，他回答道：“至高无上的陛下将比您所有的亲属都长寿。”解释的意思本身没有变化，但表达的方式却大不相同。因此，国王下令：赏第一个详梦人 100 棍子，赏第二个详梦人 100 金币。

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朋友所写的《行为指南》一书中，对下列几个方面十分重视：

—— 要选择适当的话题，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兴趣，并让每个人都能发表自己的看法；家庭隐私只能在家庭范围内谈；

—— 开玩笑一定要谨慎，切勿伤害在场的任何一个人；

—— 不能冷落老人和孩子；

—— 向交谈者表示自己的意见时，态度要委婉，不能简单地说“是”或“不”。应当加几个字：“不，维加”；“对不起，我不能这么办”。切忌这样说：“这不对”；“这太蠢了”。要这样来继续谈话：“我觉得您错了”；“您大概是错了”；“看来是给您提供的情况有误”等等。

—— 开怀大笑，把牙齿全露出来，或者动不动就笑，都不合礼节。

照《行为指南》一书作者的看法，以下几种交谈者是使人喜欢的：

—— 不抢先说话者；

—— 见别人不打算谈话，就不与人攀谈者；

—— 发生争吵时，改变话题者；

- 不谈自己的成绩和挫折者；
- 不谈别人的生理缺陷者；
- 不损伤民族尊严者；
- 不发火、不说粗话、不造谣者；
- 不取笑别人者；
- 为了不破坏大家的良好情绪而离开交际场合者。

第三节 礼节，风度

歌德曾问道：“什么东西最难看清？”我们不妨也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乍看起来，最难看清（了解）的，是我们在偶然机遇中认识不久的人。我们还在想遇见、认识和了解的人也是难于看清的。

然而，如果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我们了解甚少的那些人，在我们的想象中是相当不错的。我们认为他们应当具有我们认识的其他人和我们自己所具有的那些品质。因此，善良的人往往轻信，而不诚实的人特别爱提防别人。而且，对于那些我们希望见到的人，我们总爱用自己臆想的德行去美化他们：他们应当长得漂亮，很有教养，心地善良等等。

再说，人是十分复杂、十分矛盾的。拉苏尔·尔查写道：

老渔夫滔滔不绝说大海。

他说大海“很慷慨”，

他说大海“愁难排”，

他说大海“心肠硬”，
他说大海“太悲哀”，
他说大海“爱变样”，
他说大海“一会儿干净一会儿脏”，
“又神秘，又坦荡，
威风凛凛，唠唠叨叨，怒火满腔……”
大海就跟人一样！……

所以，对于那些我们了解甚少或者全然不了解的人，我们应当把他们作为完整的人、而不应作为我们所知道个别品质的所有者来对待，因为这个别的品质我们也是完全偶然地得知的，是在他心情好或心情坏时流露出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同意歌德这样来回答自己的问题：“你眼睛皮下的东西是最难看清的。”

的确，最熟悉的人最难评价的：他的形象要么是善的，要么是恶的，要么是愉快的，要么是忧郁的，要么是幸福的，要么是不幸的。您们不妨去找几个对你们的朋友略有所知的人来，他们定会从各不相同乃至互相矛盾的角度来描绘他。要知道，人不是某一种品质的所有者——无论这品质是好还是坏。人是各种品质的总和。因此，我们在跟人相处时，应当记住他复杂个性中的各种色调，尽管不能忽略那决定他行为方针的基本原则。

即便你们知道你们的熟人不该赢得别人的好意，也不值得违背礼节。无论你们对一个人的态度如何，外在的表现都要有所克制。完全绝对和过分直率都不能说明你们心地善

良。鼠目寸光的人才会只看到别人的缺点。心理学家布塞列娃建议：“若想不被人视作蠢货、不降低自己的威信，我们就得找到跟每个人打交道的正确行为方针和相处之道。跟疑心重的人交往要特别克制和谨慎；跟任性的人相处时，若对他的任性不闻不问、心平气和，多能奏效；对于那些骄傲自满、喜欢自吹自擂的人，适度的讥刺有助于他们克服毛病。然而，倘若跟我们打交道的是腼腆自卑的人，这样做就是不明智的。别期待性情冷淡的人会有迅速的反应和明朗的感情表现，也不要期待脾气暴躁的人会在关键时刻不动声色、沉着镇定”。让每个人都养成一定的行为准绳——这项工作是十分精细的，从道德角度而言是人道的，而从审美角度而言是美的。

不过，针对某人选择正确的行为准绳，这往往伴随着我们心中产生的复杂的心理过程。

如果你们是意志坚强的人，那你们就会去分析：当你们对亲近的人不友好时，你们是如何寻找鄙视他的原因的。你们的记忆中会浮现出自己所受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委屈、偶然的争吵和分歧。于是，你们的不友好态度如今便会被解释成公正的报复行为。或许，这是一种独特的自卫吧？要知道，过失感会引起精神上的失调、破坏道德平衡和我们天性的和谐。认识自己并及时得出结论——这便意味着克服自我，意味着从审美的角度体验环境，意味着将我们自己的行为引向全人类规范的共同轨道。

自然，每个人都应当消除自卑感。这种感觉的产生，正

象我们看到的那样，其原因就在我们自身。而律己过严、认为自己理应顺从别人，也会产生自卑感。所以，不仅应当学会认识别人，而且应当学会认识自己。而礼节会帮助解决这一切问题。

俄文中“礼节”这个词是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它的本义是：“称呼、头衔、某种仪式的行为规矩。”而在字典中，礼节的定义是一定交际场合的行为准则与交往规范。

在人剥削人的社会里，交往的法则、称呼和欢迎的规范，交际场合的行为、风度、服饰以及人类文明的其他外在表现，都被看作仅仅适于自己圈子的那些人。当着农民的面，贵族可以随心所欲地穿（甚至什么也不穿），随心所欲地说，也不抑制自己的怒火，等等。也不咬文嚼字地去选择什么“阁下”、“大人”之类的称呼。喊车夫、厨娘、仆人等佣人时总是大声吆喝，或者懒洋洋地打手势，随便动一下指头。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喊他们为“人”——一个既无姓名也无称呼的普通名词。

同时，也不能说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交往时不讲任何礼节。列宁在自己的一部著作中写到一个盖顿伯爵。此人被革命前的报刊称为民主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和人民之友。为了形象地评价这个道地的知识分子，列宁使用了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中的一个故事。你们大概还记得那位性情温和、和蔼可亲的别诺奇金吧？你们不妨深思一下：在屠格涅夫这个人物的文雅外貌和贵族酸气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

“地主招待客人喝酒，与之高谈阔论。‘酒为何不热？’

他问听差。听差不吭声，脸都吓白了。地主拉响铃子，轻言细语地对走进来的仆人说：‘去安排一下……费多尔。’”

别诺奇金知道，这句话意味着：费多尔将在马厩里被打个半死。列宁列举了屠格涅夫小说中的这个片断之后，要求人们透过地主乔装打扮的外表去识别他们“贪暴的爱好”。

革命民主主义者无情地鞭答了沙俄腐败社会制度的种种弊端。他们极其尖锐地、极富教益地描写了贵族老爷们虚伪华丽的言辞。

别林斯基在称赞果戈里《死魂灵》语言的精确性时，对自己的论敌说：“至于‘下流坯’这个词，作者也是用自己的口气来说的，正如正派的人们除了它之外，还使用下面这些词：小偷、强盗、滑头、贪污犯、盗窃国库犯、醋坛子、牛皮客、谣言家等等。而我真不明白，下流坯这个词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为什么比叛徒、谄媚者更猥亵。问题不在词语本身，而在口吻。官场和市场上那些惯献殷勤的人说话时总是彬彬有礼，一个比一个更讲究、更委婉；不过，他们所说的这些话全都使人觉得是从会场上捡来的。而一个正派人说话应当不顾情面，对什么事情都要讲真话——臭的就说它臭，下流坯就说他下流坯，而同时，他的谈话毕竟又充满‘高尚的气度’与个人的尊严、体面的内容与正确的语调。

苏联的礼节吸收了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社会政治发展阶段人类养成的最宝贵的东西。各个时期，各个民族都有一些进步活动家，他们的礼节具有人民性和民主性。苏格拉底、普希金、托尔斯泰、柯特尼亚列夫斯基——

他们既都是自己阶级的人，而同时又公然鄙视和无情批判剥削阶级的道德风尚基础，因此，他们又成了我们的同时代人。

借鉴他们的交际形式不仅不会贬低我们，反而会使我们变得更加高尚。这些形式有：“谨向您鞠躬致敬，愿做您恭顺的仆人”；“祝愿诸事如意”；“恭候吩咐”；“感愧莫名，愿效犬马之劳”。往昔伟大人物的礼节并未随同他们一起消亡，直到今天，它仍具有善、美与人性的思想。

新社会将全人类应有的行为观念最果断地引入日常生活当中。社会主义交际的人道主义丰富了关于谦恭、欢迎、祝愿、风度等传统概念。由于社会生活侧重点的变更——劳动的人成了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因而产生了一些新的规范。自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平等的公民之间开始从根本上唾弃假仁假义与口是心非。对待建设新生活的现实态度也制约着体现在礼节中的道德规范。新型的革命者——工人阶级革命领袖的经验对我们特别显得宝贵。这里首先是指列宁及其战友们。他们的礼节是在革命斗争的熔炉中锻炼而成的，蕴含着深刻的人性。1901年，捷尔仁斯基在给姨妹的信中写道：“……我憎恨财富，因为我热爱人们，因为我的每一根心弦都看到和感受到，今天……人们拜倒在金元之下，正是这金元将人心变成兽心，将人们心中的爱驱逐殆尽。请记住，象我这样的人的心中燃烧着神圣的火花……连微不足道的禾秸，这火花也会给它带来幸福。”

列宁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早在少年时代便确立了自己

的道德规范，终身遵循。他的内在文明的特点是：谦逊、随时准备帮助别人，尊重妇女。

克拉拉·蔡特金在回忆自己跟列宁的会见时写道：“列宁的行为举止，犹如置身在他推心置腹的平等同志之中。他的身上没有‘掌权者’的痕迹，他在党里的威信乃是理想的领袖和同志的威信，你会因为意识到他永远会理解别人并同时被人理解而心悦诚服地崇拜他。”列别森斯基回忆列宁时说：“他以自己的谦恭与朴实产生了迷人的印象。”别日明斯基回忆了俄罗斯共青团第一届代表大会代表团走进列宁办公室的情形。代表团中有一位少女。符拉基米尔·伊里奇站在大门口欢迎代表团，与代表们一一握手致意……他高兴地反复说道：‘请进、请进，年轻的同志们，请坐！一定请坐下！请把椅子挪过来一些。对，我们自然得请这位姑娘坐沙发。请把沙发抬过来，你们都会成为她的好同伴的……’抬沙发这件小事在我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符拉基米尔·伊里奇虽然是用开玩笑的口吻来说的，但话语中仍然表现出列宁的一个重要性格特征：尊重妇女。大家明白了这一点之后，都热心地争着去当那少女的好同伴，差点没有把地毯弄坏。”

苏联的礼节以自然大方、尊重别人、尊重妇女为其特色。礼节的自然大方——这是一种对于苏维埃人的深厚的爱，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忠诚和对于敌人的残酷无情、毫不妥协的表现。

礼节调节着风度。风度——这是一种处世的方式，也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我们上面考察过的语言特色（语调、

口吻)、手势、面部表情都属于风度。这里还包括步态——它是一种无声的音乐，既可能是轻盈的、富有弹性的、灵活的，也可能恰好相反，是死板的、笨拙的、沉重的。步态对于评价一个人关系十分重大，几乎没有哪个作家在强调自己的人物性格特征时离得了它。我们可以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找到许多关于巴黎行人步态的描写。他甚至还写过一篇《论步态》的论文。其中考察了如何通过一个人的步态来确定他的性格和职业。

一个有教养的人是不会忽略这些良好的风度的：走路时不蹒跚，不把两手插进衣袋里，不粗声大气说话。装鬼脸、怪腔怪调、不恰当的感叹“啊”、“唉”、“嗨”、“对”、“太不可思议了”等等，都会败坏对方跟你继续交谈的兴趣。

在写给弟弟亚历山大的信中，契诃夫列举了一系列构成有教养的人这个概念的提纲和原则。

他的提纲证明，美感不仅可以在大的事物中领悟，也可以在小的事物中领悟到。正如涓涓小溪可以汇成江河，琐碎的东西（事实上仅仅看起来是琐碎的）也可以构成人。

第四节 知礼，分寸，规矩

若干个世纪之前，“知礼者”这个词讲的是某种“行家”，用来特指那种懂得礼节的人。由此而产生的“无知者”，则是指不懂或无视人类准则的人。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米舍

尔·蒙台涅认为：“无知有两种：一种是愚顽蒙昧，产生于科学之前；另一种狂妄自大，产生于科学之后。这第二种无知是因科学而产生、因科学而出现的，正如第一种无知被科学破坏、遭科学毁灭一样。”

礼貌规矩并不是谁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它们是逐渐产生的。

现在以脱帽的规矩为例。它产生于中世纪。当时骑士们参加战斗或赶路的时候，都要披戴铁制的盔甲：盔（帽子）是铁的，上衣是铁的，裤子是铁的，鞋是铁的，连手套都是金属制的。这样做确实很有必要：因为他在途中随时都可能碰到危险。当他到人家停下来过夜和取暖时，就要把帽子取掉。这意味着：“我信任你，你看我是光着头的！”

虽然那种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这种规矩却是保存下来了。您脱下帽来，似乎就是在向迎接您的人或向您走进的房子表示敬意。关于握手，也可以作一点解释。脱掉手套，就意味着表示自己手里没有藏着武器。现在，脱手套则意味着对于同志的好意：我的手本来很脏，现在打算将一只清洁而又温暖的手伸给你。

知礼和无礼（粗鲁）是一个人对待别人的内心态度的外在表现。对别人的礼貌态度的形成，大都取决于他置身于什么样的人当中。对此，马克思写道：个性的发展取决于他所直接或间接交往的所有其他个性的发展。

讲礼貌亦如内在文明的其他外在表现形态一样，首先是人性。这是一种能使人成为人的能力。

安恰罗夫问道：“您们岂不觉得只有一样东西能使人成其为人吗？这绝不是计算能力、分析能力和选择能力——因为机器也有这些能力；也不是适应能力——细菌也有这种能力。您岂不觉得，只有人对于他周围的人充满同情的能力，才能使他成其为人……”

“您且从下面的名词当中选取一个来称呼这种感情吧：温柔、道德感、诚恳、怜悯、仁慈、良心、互相理解等等。无论您用哪个名词来称呼这种感情，看来都证实了这一点：人的一切属于人类的东西都与此密切相关，一切兽性的或机械的东西都缺少这种东西。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呢？人性……”

所以，最好少去学一点礼貌规矩，而应竭尽全力去为别人做好事。如果有必要，则应予以帮助。你们想必都知道，对于老人、妇女和儿童应千方百计予以照顾，要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可是，我们是否任何时候都有力量和勇气去保护他们，使他们免受粗野无知之徒的欺凌呢？同粗野行为作斗争，这也是一种礼貌。

列宁格勒的一家报纸曾提请自己的读者们关心一件事。老年妇女上车之后，一个身穿技工学校校服的少年马上让座给她。这时，坐在离此不远的座位上的一个小伙子以万分鄙弃的口吻对他身旁那个涂脂抹粉的姑娘说：

“看见了吗？还给老太婆让座哩！哎，要是我有幸认识这位绅士那可就好了！”

那少年忍不住了，开口回答道：

“在我们学校里，象你这样的人早就象清除蟑螂一样清除干净了，一个也不剩。就这么着！”

小伙子被激怒了，气势汹汹地想干一架。可是，所有的乘客都异口同声地警告他：“你只要敢动手，我们就把你抓到警察局去。自己不懂礼貌，还想要别人也跟着这样做吗？”

粗野行为之所以令人反感，是因为它表明一个人不知礼让、妄自尊大。这个小伙子有意无意地破坏了许多人的情绪，而最终可能会对他的亲友和爱人产生不良影响。再如一个售货员破坏了二十个工人的情绪，这既可能变成精神上的损害，也能用经济上的损失来计算。可是，那种可在人的心灵上占据一席之地的情绪电极，却既不能计算，也看不见、摸不着。这种不良情绪危害了人与社会的联系破坏了人类交际美的观念。

讲礼貌要求使用“请”这个字。这个“请”字犹如架设在人与人之间的桥梁能够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普遍使用的“谢谢”、“感谢您”在人际交往中也具有重大意义。粗声大气则使人感到威胁和不大尊敬的味道。

为何非问候“您好”不可呢？很难想象：你们的熟人在见到你们时会不祝愿身体健康。那么 要是前来欢迎你们的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呢？索洛乌辛的诗说得好：

我们互相鞠躬，互相问讯，

尽管我们完全陌生：

“您好！”

我们互相只说了一句，这有何高深？

简单明了的“您好”说完便悄然无声：

为什么世上的阳光会多了一丝？

为什么世上的幸福会多了一份？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欢欣？

以礼貌的态度关心他人，会使自己变得和蔼；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会以自己美的行为对一切粗野的东西发出警告。他估量形势之后，会选择适当的言辞，采取适当的方式，使已经产生的冲突消于无形。你们的记忆中想必有这方面的例子——在公共汽车里、大街上和电影院里，你们曾作过多少事件的见证人啊！

“分寸”的意义在于：接触、感情与人类相互关系的形态乃是人与人成功交往的必要条件。一个有分寸的人总是在不断地为别人谋福利、带来欢乐。他不会把任何人置于难堪的境地，任何时候都注意不用自己的行为乃至目光刺痛别人的疮疤，损伤别人的尊严。

不过，有时候你也难于马上就明白怎样才不失分寸。比如，你想对你同志的行为提出一个严肃的要求。这该怎么办呢？要向他提出批评吗？是当着别人的面还是单独跟他谈？是选择适当时机再谈还是开门见山呢？或者干脆不吭声——因为他也有我们所喜欢的优点。至于缺点嘛……太阳上也有斑点啊。

不过。要是你们真爱自己的朋友、尊重别人，那就应当讲真话。为此，应该寻找最好的机会、适当的言辞，考虑对方的性情，预料你的批评可能引起的反响。务必不要损伤人

的尊严……

再来看一个例子。

沃洛佳来找叶戈尔

“打开电视，我们玩一会儿！”

“不行，沃洛佳，明天的文学课还没有预习好。”

“等你完成功课，第一个节目都播完了。”

“对不起，沃洛佳，我不能这样。实在对不起。”

“你呀，还算是我的朋友哩。”

叶戈尔做得对吗？当然对。如上所述，友谊的保持有赖于相互间的了解，而不在于一方无原则地向另一方让步。应当永远了解对方，这样才可能成为知交。

分寸——这也是内在文明的表现。马卡连柯说 有一次，在捷尔仁斯基公社里，人们正在擦地板。不知是谁穿着一双脏靴子从擦得雪亮的镶木地板上走过。“……小事一桩。我请你们相信，无论是小偷还是流氓都不曾这样使我大动肝火。”这位伟大的教育家激愤地写道。“为什么会踩脏呢 因为谁也没看见。要知道，这很可能就是那个最优秀的公社社员，他要求别人循规蹈矩，自己也是一个呱呱叫的生产突击手，样样事都走在前头。可是，当他独自一人时，当没有人看见他的时候……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喊同志们去上班，而他自己却偷奸躲懒，打扮得漂漂亮亮，吹嘘得冠冕堂皇，因为没有谁看到他干了什么勾当。”有分寸的人的脚印不是留在镶木地板上，而是留在人的心中。马尔登诺夫有诗吟道：

而你呢？

走进任何一幢房子——
或走进灰房子，
或走进蓝房子；
爬上陡峭的楼梯，
走进光线明亮的住宅，
倾听琴键的声音，
回答我的问题。

请你说：

你留下的是什么样的脚印？
是为了擦地板

和斜着眼跟着看
而留下的脚印？
还是

无声、持久的脚印，
在别人心中多年留存？

各个民族都按照不同的方式形成什么合规矩、什么不合的概念。

苏联社会能够吸取各民族最珍贵的东西，运用前人积累的东西。如果全体苏联人都吸取各国人民的一切优美的东西，那他们就会致力于进一步发展文明。从而丰富自己的“文明宝库”。一个具有良好教养的人的举动是由他们对祖国人民的爱和对于别国风俗的尊重所决定的。

规矩是约定俗成的，不照它办事也不会遭致惩罚。你们

握手时可以不摘手套，见面时可以不鞠躬，在妇女聚集的场合也可以抽烟，在公共休息的地方也可以随随便便。可是你们可别指望这样做会赢得周围的人的好感。

当你们进入另一个民族的人们的社会时，最好别违反你们的东道主朋友们的传统风俗。

比如，在日本，无论怎样握手都不合规矩：那儿的规矩要求鞠躬。奥符契尼科夫有趣地描绘了日本人的迎客规矩。日本人见到熟人之后，当即停下，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有时甚至就停在交通要道正中。然后腰部就象被折断了一样弯下去，两手伸开，手掌就象沿着膝盖往下滑。屏住呼吸弯腰几秒钟之后，才诚惶诚恐地抬起一只眼睛来。面对面鞠躬的这两个人机灵地打量着对方，因为先伸直腰的人会被看成不知礼节。这位随笔作者说：对于旁观者，这个场面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两人都患了腰部风湿症，无法将腰伸直。据东京报纸统计，一个职员每天平均要鞠躬 36 次，而商店经理则为 123 次，百货商店开电梯的姑娘竟达到 2560 次。由此可见，这种礼节形式已何等深刻地进入了日本民族的日常生活当中。

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回忆说，曾经有一个中国妇女向他谈到自己所遭受的痛苦，而她的笑容每次都在他心中激起极其强烈的印象。原来，她知书识礼，生怕影响交谈者的情绪。这就促使我们同作者一起深思世界令人惊诧的多样性和千奇百怪的人类风俗习惯，其中的每一种都流传了数千年。

很难勾画出交际与行为文明规范的范畴，它们的面目是各不相同的。不过，要说出表现对于人的诚挚态度的各种场景，那是十分困难的。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准备置身于良好意愿的浪涛之中，善于通过交际规范来表现自己的精神情绪。重要的是，要使良好的行为不断重复；重要的是要培养起自己的良好习惯。良好行为的自觉性会将各种年龄的人吸引到我们身边来，使我们的理智在选择道德行为时不至于那么困难。

可见，交际的文明规范是一种无价的资本，要求我们不断予以补充。在这里，大概也象任何一种人类活动一样，理论与实践是密不可分的。宁肯少知道一点交际文明，首先要成为一个文明的人。

知礼、分寸、规矩与其他人际交往形式，是一些唯独人才具有的品质，它们源自人的行为与思考，应当象人的劳动和呼吸那样自然而又简易。只要我们还未认识这一真理，我们就很难同周围的人们找到共同的语言。

第四章 外貌美

第一节 时髦^①

当你们的朋友披着古罗马帝国时期的托加衣^②招摇过市的时候，岂不会遭到人们的白眼吗？因为你们的朋友不是演员，电影摄影机也没有对着他，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小伙子。无论他的眼睛里闪耀着多少智慧的光辉，无论他胸中蕴蓄着多少善良的心愿，也无论他的优雅风流在世上无人能与之相比，但他的奇装异服却会使他这许许多多无可争辩的重要优点变得令人生疑。我们与其说是凭经验、勿宁说是凭直觉知道：道德品质和审美品质跟服饰密切相关。在一定意义上，服饰变成了道德与美。宇航设计师能否指出：宇宙飞船中什么零件是次要的？不能。因为缺少任何一个零件，这极其复杂的设备就飞不起来。时装也是如此。要是少了它，道德就

原注：“时髦”这一概念涉及许许多多与生活方式有关的现象：如时髦书籍、时髦运动、时髦职业乃至时髦政治潮流等。毫无疑问，时髦会对人的行为、日用物品和生活作风的选择产生影响，并形成其审美理想。我们此处考察的时髦仅就服饰的选择而言。

托加衣，古罗马男人穿的一种长衣：以一块布从左肩搭过缠在身上。

——译者

会变得枯燥，美也会变成僵死的。当我们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回忆起来的不仅仅是熟人的话语、表情和动作，还有他们的服饰。人们有的爱收拾打扮，有的不修边幅，但毕竟有所选择。我们也一再证实：选择的艺术是一桩严肃的事情。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服装和它的主人交换了自己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人已经不是根据自己的特点去选择服装，而是服装将其主人的外貌改变得面目全非，从而与之较量：看谁的本事大。不合尺寸的衣服会使人的体形改变样子。不相称的衬衣会使人老气，变得难看，令人看着有一种不舒服的味道。

我们的生活是由节庆和寻常日子所组成的。每天都可能有成功和失败，有欢乐和忧愁，有明媚的阳光和恼人的迷雾。我们的精神状态常常会用服装的色彩和式样来表达。当中学的最后一道下课铃响了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身上的校服箍得太紧，没有必要再穿了，而且会第一次急切地冒出这个问题：“该穿什么去参加毕业舞会呢？”从此以后，“穿什么”的问题就老是萦绕在你们的脑际，并且终身伴随着你们。要是你们每次都能给它一个不同的答案，那就再好不过了。

当然，谁也不打算鼓动你们去追求时髦。年轻人不用鼓动也总是在极力接受新颖的款式。你们每个人都会说：“时髦是必不可少的。至于为什么——我却不明白。”我们并不奢望你们在读完这本书后就会象认清交通信号一样什么都能明白。我们坚信的是另一方面：为了解决这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必须进行公民教育和职业教育。我们应当记住：一定的

班级、学校、企业乃至于一一定的国家的概念是什么，我们的仪表应当如何反映社会意识的积极情绪。我们的责任仅仅是展示我们的一个极宝贵的秉赋：高尚的审美情趣。

这样，我们就得从法律标准和审美标准的立场来对待时髦，而这些标准是作为特定社会的体现者的特定的人所应具有的。

关于时髦的问题，过去一直争论不休，现在大家也还在争论，这是因为时髦涉及到人类“自我”的一个深刻的方面。

时髦产生于原始社会，一开始就成为区分人们贫富的外在标志。当代的许多人类学者查明，一些部落的妇女根据其社会地位的差异，在脸上作不同的装饰。

研究原始社会的人们有根据地论证了这一重要规律：时髦作为一种审美趣味的标志是从实际需要中产生的。这里指的不只是由于气候条件不同而对于服装式样的选择。原始人特别喜欢色彩鲜艳的装饰。他们在头发、指甲和身上染色（这种习惯遍及世界各地），而其目的在于交际（交往、联系）。原始人的衣服很简单，式样差不多，因此不可能表示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它也不能够反映猎人或战士的道德意志品质。人类那时还不懂得等级符号、奖章和肩章。所以，男子也跟女人一样在自己身体的裸露部分作记号。于是，这些色彩斑斓的奇特花纹就雄辩地证明了他的英雄业绩和他感受到的胜利。这些胜利确然获得过吗？一般说来，原始时期的男子是希望取得的。不过，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种时髦表

现了他们的审美理想。应当指出，猎人们将野兽的牙齿挂在脖子上，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自从阶级社会产生以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在服饰上的差别就越来越明显了。而且，服饰还使社会差别固定下来，反映出阶级的法定划分。比如在古罗马，托加衣就只准罗马自由公民穿。而属于元老阶层的人才能穿系着红带的白色东尼卡（一种短袖长衬衫）。而平民阶级则无权穿东尼卡。

在阶级社会中，豪华的服饰突出了穿戴者脱离体力劳动的特殊地位。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表人物常常违反本阶级讲究贵重眼镜的传统而爱穿补巴裤子，破旧上衣，不注意修饰，似乎并不强调社会地位的差别。

美国黑人作家詹姆士·鲍都印看穿了这种反常状态：“众人都是那种司空见惯的样子：穷人穿得阔气，而富人穿得寒酸。”这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退化的又一证据——这里仅仅指的是服饰：只有那些审美趣味败坏的人，才会以寒酸为荣。

就在不久之前，“自由世界”的服装设计师设计了一种带有防弹层的运动上衣以及类似的帽子、西装上衣、裤子和大衣。当代时装专家认为，选择服装的趣味取决于对价格合理性的感觉。他们也考察过美国都市钢筋水泥丛中夜游服装的价格合理性。发现许多服装的价格远不是从美的角度来评定的。比如，一件防弹上衣值一千一百美元，而防弹大衣则值六千美元。这种所谓的合理性还表现在：“防弹时装”的倡导者同时又是射击武器、特别是柯尔特式机枪的推销者。这种

枪柄镀金的武器每支值一万美元，其子弹能轻而易举地打穿防弹衣。

时装的审美作用具有阶级性，它主要取决于经济条件、工业生产水平、民族传统以及其它一些社会生活因素。这些因素往往用一些意味深长、难以琢磨的词语来表达，比如“时代精神”、“时代风尚”、“文明进展”等等。这些奥妙的定义给时髦罩上一层光圈，使人觉得时装风尚的变迁神秘莫测。不过，倘若考虑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某些奥妙也并不难于理解。为什么到1980年的时候还会出现我们的曾祖母们在二十世纪初穿过的那种小皮靴呢？这是因为：世界市场上皮革的价格涨了两倍。于是，制鞋厂主们拿定主意：如果只卖老价钱，就得把鞋筒去掉一半。外观如同皮革的聚氨脂靴底的风行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工业生产的革新与新纺织品的发明会导致这种或那种新服饰的出现。

由于当代信息灵通，时装的流行没有界限。牛仔裤本是美国牧马人穿的、可现在已经风靡全世界。过去，俄式长衫只有俄国人穿，其他地方谁也不穿，可现在却成了名为“阿尼亚留斯”的时髦绣花长大衣，被法国人拿在世界许多国家推销。著名的时装师蒂奥尔·波柯销售的“乌克兰”衬衫不是在基辅、也不是在波尔塔瓦生产的，而是在巴黎制作的。

可见，服饰的民族传统会被服装师采用，因为一个民族在民族服饰中表现了它的全部财富和美。

当然，并非所有的时装变化情况都可以用经济因素和民族传统的普及来解释。为什么色粉光泽的纺织品会在1980年

成为时髦？为什么喇叭裤会过时？为什么聚氨脂纤维肩和一身明显的服饰会风行起来？……

要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从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出发：服饰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交际，是为了选择一种使别人理解和看重的方式。时髦是交际艺术不可代替的特征。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从古到今，人身上的服装（就其广泛含意而言）并不是一件东西，而是具体的人在具体场合，具体季节、在白天和夜晚的一定时间的活动。

时髦在其发展中要经历几个阶段，至少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标志着时髦的产生。此时只有极少的人接受它。第二个阶段中有不少人追求这种时髦。第三阶段是其回光反照的时期：过去视作标新立异甚至不可思议的东西，此时大多数人都接受了，即便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

最有意思的当然是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具有冒险性质——突然间会感到不习惯，你不仅会觉得在道德观念上没有准备，在物质方面也缺乏准备。第三阶段已激不起任何热情——还是把它留给老年人吧。且让我们悄悄告诉你：一般来说上了年纪的人在服饰方面比较倾向于保守。因此，那些尚未被证实具有生命力的款式，他们穿起来，总觉得很别扭，或者根本接受不了。

因此，最吸引我们的是第二阶段。在某种时装显得比其他服装更优越的时候：这一阶段会推动群众对它的广泛需求。许多人明白：设计的式样很美，但工业暂时不打算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这种东西就会在商店里成为紧俏

货，或者象售货员所说的那样，供不应求。这样的东西所具有的价值并不取决于投入其中的劳动量。

对服装的选择带有某种模仿别人的自然趋向。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时装的存在，并成为形成各种审美趣味的重要根源之一。与此相反，尽量不模仿别人甚至标新立异——其中也能找到美感的形成与时装变换的深刻根源。这些矛盾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为补充：我们不妨把时装称为“熟悉的陌生人”。跟别人穿同样的衣服，把自己打扮得符合“时代精神”而同时又表现出自己的个性——看来，这就是我们的愿望（尽管暂时还没有实现），或许，时装设计师苦心寻求的主要构思也正在于此。有时，时装设计师也跟其他人一样，善于表现自己新的生活方式。人一经跌进别出心裁的款式和色彩的河流之中，就会获得新的道德品质和审美品质。读完八年级^①的姑娘穿超短裙比十岁女孩子穿长裙和中专生与大学生穿牛仔裤更超越社会心理状态。每一种新的服饰都要求一种新的兴趣范围，甚至要求改变走路的姿态和与人交谈的方式，等等。

不过，现在该从另一个更深的层面来考察我们所研究的问题了。因此，必须涉及一系列问题，而其中最迫切的问题是：“是否一切时髦的都是美的？”

乍一看，似乎不可能有两个答案：“对，一切时髦的都是美

^① 苏联中小学实行十年一贯制，八年级相当于我国初中三年级或高中一级。

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论证说：“时髦”这个概念是跟舒适以及新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社会向前发展的一个符合规律的过程，回避时髦犹如虔诚的心灵回避美菲斯托菲尔一样徒劳无益。当然，这并不是指下述情况：“大家都穿，我干吗不穿？我又不比别人差！”舒拉穿上了，可奥丽嘉感到嫉妒。因为她还没有弄到。我们的时髦姑娘（正因为如此她才同我们争吵）按她那种令人怀疑的评价方式将女友们评论一通之后，得出结论说：“谁有时髦东西，谁就穿戴在身上；谁没有时髦的东西，谁就憋在心里。”

这种看法，一般说来，是在日常意识的水准上，在关于外貌美的许多肤浅概念中形成的。应当使聪明人懂得什么是美，什么有益。应当直观地向他们证明，不愿多动一下脑筋的人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因此，时髦就会具有普遍感染力。

某些时髦式样的兴衰在大多数情况下跟公用信息手段的发展有关。不过，那些一盲目模仿某个电影明星的服饰的人，顶多也不过是考虑了自己与那位著名演员体型的相似之处。至于气质、性格以及其他纯属生理方面的品质，那就弄不清了。而且，女演员在选择款式和花色的时候，也在选她所希望产生的印象。她的服饰所必定包含的信息中，不仅有关于电影角色的兴趣爱好的信息，而且有关于他的观点、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的信息——比如对公认的行为准则的直接呼吁。

人们内心世界的财富也会反映到服饰中来。它应当充实

个性，应当成为我们共同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时，随着穿戴漂亮的需求日益增长，人们改善自己的风度并在社会生活中变得更加关切别人的要求也会不断增长。反之也是如此。

这里指的是：对于服饰来说，诸如美、和谐、优雅、分寸、体面等概念都是比较合适的。个人内在品质的外部形态正是通过这些伦理学和美学范畴的名词而揭示出来的。穿着阔绰的衣服参加中学晚会，只能说明这个学生有意哗众取宠，而最根本的，是说明他的文化修养不高。因为文化修养最重要的标志是不故意招惹人注意自己，不在同班同学中炫耀有鲜明标记的进口服装。想通过时髦的东西来赢得声望——难道还有比这更无聊的吗？还有如此表现自己的优越性的：“我有，你没有。”一个正派的人未必会这么干。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消耗在这些鸡毛蒜皮上，我们怎能去实现那些远大而又崇高的目的呢？

服装是个性的不可剥夺的标志。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展示自己的审美趣味，而不是炫耀自己的穿戴。应当展示自己对优美的理解。一般说来，这种理解是与最高尚的道德——审美品质密切相关的。比如，别林斯基写道：优美的感情“是人类优秀品质的条件，只有具有这种感情，人才会聪明；只有具有这种感情，科学家才能上升到世界思想的高度，并在这些思想的共同性中认识其本质与现象，只有具有这种感情，人才会在自己的一生中建功立业，百折不挠。若是没有它，没有这种感情，就不会有伟人，不会有天才，也

不会有智慧——而只剩下庸俗的‘健全理智’当然这是庸庸碌碌的生活和个人主义的斤斤计较所必不可少的。”

在这里详解词典中，优美、优雅这两个词是与艺术相联系的，“优美，优雅，漂亮，美，文雅——这些词是跟艺术、美术一致的完全是由趣味所决定的。”一个风度优美的人不应盲从时髦，他只从中选取适合自己的东西。他不穿刺眼的、招惹人的服装。如果他对新时装的合理性还有所怀疑，就不妨穿上一个季度流行的时装。优美要求服装的颜色跟一定的体型严格相称，跟穿著的时间相协调。如果在阳光明媚的夏天穿深色的裙子，你们就会觉得自己缺乏自信，情绪也会变坏。可以设想，不仅你们如此，别人也不例外。而且，服装的各部分在色彩上也要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风度优美的人也要考虑比例的协调：发式、提包的大小、大衣的线条等是否与你们的身材、性格和气质协调？服饰的大方和优美是审美认识最重要的因素，它能突出个性的美。

可见，在服饰美学的合理影响下，我们自己会不知不觉地获得一些新的品质，在自己身上体现出一些新的社会观念，一句话，逐渐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共产主义明天的人。

第二节 娱乐

大自然公正地把每昼夜的同等时间分配给我们每个人，也公正地把安排时间的能力分配给我们每个人。

不过，正是这第二个方面——安排自己时间的能力——

在生活中带来了实际上的不同等：机会相同而结果各异！一个人在国家、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取决于他为时间付出了多大代价。

正如科学资料和社会历史实践所证实的那样，人丰富多彩的活动乃是美感萌发与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空闲时间——这是工作时间的产物，只有在谈及劳动的情况下，我们才谈得到空闲时间。具有社会意义的空闲时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力。空闲时间为按照美来创造开拓了无限广阔的天地。要是专家们的话靠得住，那么，到20世纪至21世纪之交，每周的工作时间就将是30小时，而每人每年总共只工作40个星期。这一切将为人类聪明才智的空前发展提供条件。

空闲时间可用来进行更为“高级的活动”。由于这种活动而变得更加充实的人，会以崭新的面貌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对于他来说，劳动变成了一个创造过程。

因此，我们应当要求自己合理安排时间，做一个守时的人。

凡是有幸接近过列宁的人，都谈到他善于制定详细的计划，并且安排时间极其有效，简直象是在压缩时间。

“列宁的工作日安排得十分紧凑。”巴戈茨基写道。列宁居住在克拉科夫期间，他天天都要跟列宁见面。谢马斯科证实，列宁的确是个科学地组织劳动的典范。他安排时间的精确性到了令人惊奇的地步。克尔日让诺夫斯基强调了“这个不知疲倦的劳动者对于工作的安排所激起的敬意”。

让我们来审查一下自己一周间的时间预算吧。睡觉 50—66 小时，早中晚餐 5 小时（每天平均 45 分钟），个人卫生及杂务 2 小时。这样，合理地满足生理需要的每周平均时间总共为 65 小时。

社会公益劳动和学习构成了日常活动极其重要的成分，每周为 70 小时。上下班花在路上的时间（8 小时）和自我服务时间（2 小时）也归入自己的工作时间。

结果发现，工作及与之有直接关系的每周时间总量在合理预算中接近 50 小时。这个数字还得再加上每周用来从事社会工作的 2—3 小时。

考虑到每周的时间总额，就不难算出余下来供自己支配的时间（ $168 - 65 - 50 - 3 = 50$ 小时）

这 50 小时是在工作和上下班乘车之外的，除去了用于生理需要和日常生活需要的时间，也把履行社会职责所费的时间减去了，因此，我们把它称为空闲时间。空闲时间这个总体一般分配给五个方面的活动：1. 体育活动；2. 实践活动；3. 文化艺术活动；4. 智力活动；5. 社交活动。

人们往往是按照自己的认识来在工作时间之外安排娱乐的。娱乐也具有活动的功用，只不过这种活动具有选择性，与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及体力和智力的恢复有关。这并非意味着，在空闲时间和社会活动之间存在着一个无底深渊，人的大脑并不象电器上的开关那样可以随意关闭。你们在听音乐、旅游、观察星空之时，会想到学习（或工作），尤其当你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人的时候。伟人们的生平表明，重大的

发现大都是在空闲时间作出的（比如物理学家帕斯卡、法拉第和牛顿）。然而无论如何，空闲时间还是以不考虑工作为好。疲劳消除得越快，精力就恢复得越快。

工作与娱乐相互作用，使我们每个人都变成富有创造性的人。正因为如此，马列主义理论才不将劳动与娱乐对立起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企业家利用人的天然爱好（追求新奇、多样、爱赶时髦）我们国家则与之不同，在这里，劳动和娱乐都具有创造性。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不仅是在劳动中、而且是在娱乐中形成的，它表现为社会利益同个人利益的统一。

不过，娱乐也有其独立的价值。马克思说，空闲时间是一种用来发展人的各种能力的空间，它可以用来进行教育、发展智力、发挥社会影响、密切同志关系以及进行体力和智力游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财富不是按照商品生产的数量，而是按照空闲时间的多少来衡量。列宁谈到，劳动者需要空闲时间来休息、发展自己，行使自己作为人、作为家庭成员和公民的权利。

尽管社会还不能提供足够的时间来发展我们的天性，它毕竟对于我们如何进行娱乐十分关切。每一个城市和乡村都有俱乐部、电影院、图书馆、供娱乐和休息的公园、体育场和业余艺术小组等等。这一切都有利于培养乐观的人生观、较高的审美标准、高尚的趣味和交际文明。同时，文化生活设施网也在不断扩展。

当然，在谈到娱乐问题时，有句话老是在我们脑际萦

回：“凡是想有所作为的人，都在寻找办法；凡是不想有所作为的人，都在寻找理由。”这是一句著名的格言。空闲时间的作用取决于我们的文化教养、理想、道德品质、审美要求和审美意愿。

要是我们注意到我们每个人一生中只有那么一点点由月、日、时、秒组成的年岁，那么，难道值得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浪费时间吗？

社会调查证明，人们把空闲时间看得比工资还要重要，特别是在青年人当中。一般地说，年轻人都想把自己的空闲时间过得有趣一些。关于这个问题，塔林的社会学家们写道：

“曾有人建议年轻人作如下选择：假设有两个城市可供你作居家选择。一个城市工资高，但消遣空闲时间的方式极其有限，另一个城市工资低，但空闲时间可以尽兴消遣，如学习文化、从事体育运动、逛俱乐部、看戏等。您选择哪一个城市呢？结果，81%的人投了第二个城市的票。当人们感兴趣地问，被调查的人当中希望自己的生活与父母的生活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呢？许多人的回答是：‘想多旅游一些地方’（39%）‘想多有一点消遣’（25%），‘想多有一点空闲时间’（20%）。值得注意的是，想有华美舒适物品的人只占13%。”

还应注意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我们能否合理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

多姿多彩的生活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玩笑，对于青年来说，这个问题尤为复杂。原因在于，人在早年的时候，什么

都有，也什么都没有。这个悖论应当这样来理解：青年人有着健康的身体，有安定的社会环境，住在家中，还有妈妈按时供应饭菜。这一切都来自大自然的恩赐和别人的施舍，至于他们自己，暂时既没有任何积蓄，也没有任何东西是自己挣来的。

因此，我们有时就会看到，有些人的生活态度就不那么严肃，而是玩世不恭、横蛮无礼。你们想必还记得普希金的小说《射击》中的一个情节吧：那个年轻人在决斗时还在若无其事地吃樱桃。他这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使得他的情敌——老练的决斗士希里维奥无限期地推迟决斗时间，只保留了射击的权利。五年之后，年轻的伯爵结了婚找到一个差使，在生活里扎了根；或者象美尼奇科夫所说的那样，领略到了“生活的情趣”。这时希里维奥又来找他。这个曾经在决斗之前若无其事的人，现在竟显得如此惊惶、如此胆怯！

由此可见，你们越早在生活里扎根越好。优异的成绩、顺心的工作，掌握伦理道德规范——这显然还不是正常、健全生活的全部内容。需要在每周50小时的空闲时间里去发现自己的某种隐秘的东西：它既符合我们的天性，又能表明我们的差异。

娱乐的技巧是有趣的也是千差万别的。它表现为一系列心理的、经济的、文化的、美学的和其他的问题。一般说来，一批要求满足了，又会产生第二批、第三批要求，满足的链条就是这样无休无止地向前移动，由此较简单的满足变为比较复杂的满足。人的个性越是丰富，他的娱乐范围就越

宽，他的精神因素、创造因素就越深刻。

要区别积极的休息与消极的休息。可是，要想在积极休息与消极休息之间划一条界限，即便在理论上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比如，观赏百花盛开的花园——这是积极休息还是消极休息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清楚这满树繁花在具体的心中激起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是打算给邻居写一封匿名信呢？还是寄给他一首《苹果开花》。在长篇小说《画图》中，格拉宁用好几页篇幅来描述他的主人翁——一个兢兢业业工作的大忙人。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他在观看爱人试内衣和买内衣时，自己既不感到气愤，也不觉得不耐烦。“洛谢夫远远地站在一旁观看，连自己也十分惊奇：他居然不觉得不耐烦。试衣服这件事已随同昨天的消逝而过去了。这是很漂亮的一天，每一秒钟都历历在目。他获得了一个重大发现：如果分别考察每一小时，并沉迷于其中，就会看到“每一点点生活，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没有任何时间是多余的、不必要的。试内衣不是暂停，也不是对未来的准备。如果添置新东西是一种满足，一种革新，那么吃饭、穿衣和游戏也是。生活——全部生活——可能就是由我们应当善于发现的这些奇迹构成的。”你们大概已经看到 亲爱的读者，这段情节谈的是：爱人的行为，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即便是平平常常、微不足道的情況下，都会令人激动。使人用诗人的眼光去观察平淡无奇的生活。然而，如果不是为了活动肌肉、吸收新鲜空气和改善新陈代谢，那么，即便在环境优美的高级疗养院

里休息，也会一无所获。

在消极休息与积极休息的发展中，毕竟有规律可循。比如消极休息就很不讲究休息手段：“无论怎么休息都无所谓。”——这便是喜欢这样休息的人们的格言。他们并不抱某种确定的目的。

与家人促膝谈心，躺在床上消磨时间，一边听喜爱的乐曲，一边乘上幻想的翅膀尽情驰骋自己的想象，丝毫不想回到罪孽深重的大地上来——所有这些都是消极休息。当然，思想上的放松是完全必要的，要是没有消极休息，人本身的存在就是不可思议的。不过，消极休息不可能长时间保持中立，要么过渡到积极休息，要么滑到公然无所作为的地步。

社会调查表明，大多数年轻人追求积极了解生活。52%的青年认为生活的价值在于知识和才能，20%的青年认为是拥有忠诚的益友，只有2%的人特别看重物质享受（其余26%的调查对象未明确表示自己的生活立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把幸福看成是消遣和享受的人，总共只占0.78%。

消遣是积极休息的初级阶段。这里也同消极休息一样，人们没有提出确定的目的。偶然弄到一本书——那就读一读吧，会到一个朋友——去看场电影吧，碰到下棋的机会——那就请！

消遣解决的任务是：把负担转移到未参加劳动的那部分肌肉上去充实那些处于怠惰状态的心理区域，让即兴艺术才能发挥作用。参加体育运动和户外游戏，看电影、电视和戏剧，参观展览，与朋友来往和观赏大自然，都可用来解决

上述任务。

在此之后，便是表现自我的更为复杂的过程。起初，我们是有选择地来对待自己的消遣。人在进入不断扩大的现实圈子的时候，总是试图达到逾越其实际利害界限的那一部分。这或许是一条通向自己直接从事的工作的“捷径”吧？无论其情况如何，这都是对于和谐、美和多样性的探索。

在这一阶段，消遣乃是一种强烈的兴趣，亦即所谓嗜好。嗜好取决于一个人的文明水平。人类的嗜好世界是没有边际的。正如消遣一样，嗜好不是偶尔为之的爱好，而它总是跟个人生活的某一范畴的经常性迷恋有关。透过人类心理的复杂迷宫，嗜好能使人和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有利于提高他们的一般文明和职业文明。

从事艺术活动、旅游、体育运动、收藏、钓鱼等都可算作嗜好。在这方面，人不会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狭小，不会丧失多样性而只保留一种嗜好。恰恰相反，他们的生活将变得更美好，具有更深厚的道德，更为明白事理。更其重要的是，这种人的想象会变得特别发达；在这里，想象指的是对象和现实现象的鲜明的感性形象。

嗜好的心理状况是在由一种活动向另一种活动的过渡中形成的。这里指的智力积极性和体力积极性的合理结合。上中小学时，你们成天坐在课堂上，因此你们的嗜好多与运动和体力活动有关。相反，嘈杂而又流动的工作却往往使你们在图书馆、展览厅和象棋俱乐部去度过休息时间。

情况常常是这样：各种嗜好都可能在对生活意义的探索

中获得严肃的涵义。它们能使学习成绩差的人感到慰藉。在谈到那些高年级学生时，父母往往会说：“对于他呀，动物就是一切！”不过，嗜好是否可以代替实际的积极性——学习积极性和生活积极性，那毕竟是一个特殊的问题。

要正常发展，就得协调地发展。在协调发展中，学习（生产）活动理应是头等重要的东西。

嗜好的高级阶段是创造。谁若认为创造是少数人的领地，那便是大错特错。每个人都具有创造能力的，正如春天的花园以五彩缤纷的盛装令大地欢欣一样，人类社会也因天才而繁荣昌盛。天才表现在艺术创作中，也表现在科技创造中。

创造的意义不仅在于创造者能揭示出新的知识宝藏，而且还在于只有人才具有创造的天赋，才能把自己培养成为大写的人。

所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切不可把娱乐的意义评价过高。娱乐不是用什么东西都可以填满的“空白”。随着人民福利事业的增长、文化水平的提高、空闲时间的增加。个人娱乐时间的问题已超出道德规范和审美规范的框框，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第三节 物质享受

人在改造周围世界的时候，也在创造“第二自然”——建筑设施、生产工具、交通工具、家具、服装等等。这些东

西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时时刻刻伴随着我们。实际上，对于艺术作品，我们可以读，也可以不读；对于每个人，我们可以同他交往，也可以不同他交往。但是，我们的眼睛不能不看许多东西，我们的手也不能不碰着它们。所以，得从生理、心理、社会和审美的角度来对它们进行评价。

每一样物品都是人类劳动凝结而成的，都具有一定的作者。这些物品永远或者暂时地“登记”在一定的人、社会和国家的帐上。有些东西是属于全人类的，世界艺术的瑰宝即归于这一类。

社会法规保护着物质财富，要求珍惜它们（特别是属于社会的物质财富）严禁非法地占有它们（贪污盗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物品的目的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或是为了满足需要或是利用对于新奇物品的迷醉，使之成为牟取暴利的手段。就这个意义而言，物品的价格并不符合它的使用价值。物成了具体化的人类本质力量的属性。

人对于物的态度表明了他对社会、对别人以及对他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态度。因为在每一样物品中，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作者自己的形象：物品做得越好，制作者的个性在其中就反映得越多。物品越完美，人也就越完美。制作者的心灵美似乎也使我们受到感染，促使我们将自己所能创造的一份美也带进繁复的世界中去。

物在人的复杂天性中留下烙印的同时，能使其周围世界变得更加多姿多彩，更加富有，形成人的审美趣味，使人的

娱乐积极化，有利于改善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假使你们曾注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个人生命结束时的商品量为其出生时的32倍，那么，你们就会看到，审美目标的转移会有多么频繁。

应当看到，美的物品在适当的条件下会取得相对的独立性。这一点，早在古代便已有人提及。你们不妨回忆一下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变形记》中的一个传说，其中谈到了物品的独立价值。塞浦路斯大艺术家比格马尼翁爱上了他自己制作的一尊象牙美女雕像。爱神怜悯这个可怜的情人，在象牙里注入生命，在雪白雕像冷漠的眼睛里点燃了爱情之火。

科技革命使美的物品的数量大大增加。无论是建筑综合体、车床和农村的联合收割机，还是机器零件和服装，都证明它们的所有者具有一定的审美趣味，拥有一定资财，能够运用民族传统和先进国家的成就。美的物品似乎也会为自身说话（有时甚至是大声疾呼）。“建筑和桥梁，沙发和花瓶，似乎都能意识自身的价值。物品的外观开始用自己优美的语言对我们说：‘我是美的’，‘我是优雅的’，‘我是雄伟的’，‘我诗化了生活的散文’，‘我表明国力的强大’，‘我使自己的主人与众不同’，‘我美化时尚’，‘我歌颂工艺的合理’，‘我赞美人的劳动’。”^①

然而，物品毕竟不可能有充分的权利来代表人的任何品质，比如善良、博爱、真诚、美等等。物不能代替个人——

这是勿庸证明的。它没有心理特征，也不具备气质和情感。

它的确能够带来美的信息，但只有社会的人才能欣赏美。

作家汝霍维茨基在《姑娘寻找皮袄》这篇小说中十分精辟地指出，与文化教养的相联系的物品换了个情况便不能发挥作用。

……有一个姑娘的个人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她多次听说过的那种爱情，虽然五彩缤纷，却只不过是沒有实现梦想。没有谁向她奉献鲜花，也无人为她唱柔情的小夜曲。甚至根本就没有人与她约会；而这时，幸运已给她的女友们带来了爱情、关切和希望。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有一天，她突然如梦初醒：应当有一件女友们穿的那种皮袄，那样，她的愿望便会实现了。为了积钱和找门路去买皮袄，女主人公费了很大的劲。她的目的总算达到了。然而，使我们感到遗憾和使她感到痛苦万分的是，一切也到此为止了。皮袄既没有魔力，也没有带来童话中的王子。哎，不仅没有王室气派的王子来找她，甚至没有一个年轻的熟人对她感兴趣。

可以从纯实际的角度来认识这个姑娘，也可以用科学的观点来分析她。不善与人相处，不懂交际文明，势必给自己带来绝缘和孤独危险的。对于这个问题，哈尔切夫教授写道：“衣着、动作和姿态文明的重要性并不在其本身……那种所谓，‘外在文明的’的东西不仅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而且根据它所培养的相应目标，在人心激起一种稳定的追求，去实现他最大限度地积聚于自己身上的良

好倾向。相反，不善与人交往是一种特殊的不治之症。它能使人产生屈辱感和自卑感，使他的性情变得凶狠，在他与周围的人们之间——从而也在他自身与社会价值体系之间形成一条“疏远带”。

所以，人在物中只能反映自己，而不能表现自己。

尽管用这种语气来谈论汝霍维茨基笔下的女主人公未免使人伤心（姑娘家总是希望别人对她客气一些），但对于她来说，如此费劲地买来的皮袄既非是御寒手段，又非是能使自己显得“与众不同”的物品，亦非具有价值和可以交换别人劳动的商品。这只不过是一张放在一堆没有王牌的扑克中的王牌。这件皮袄无非是想用来弥补精神的空虚、见识的狭隘和感情的贫乏。然而，任何物品，即便是最美的物品，也不能代替精神的美。这一点，她周围的小伙子们是十分清楚的。

对于青年人来说，对外貌效果的完全自然的追求和内心世界的不自然的空虚，往往会从另一方面导致严重的不文明和不礼貌，而不可能产生别的效果。在物质享受上斤斤计较，这是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所不能容忍的。斤斤计较的道德是资产阶级道德的实质，这种道德是冷酷的、过分认真的。一位英国数学家写道：“竞赛理论对于在复杂的形势下选择行动提供了明确的说明。关于人们所必须遵循的某种行为方式的概念，不能看成是基于法律和伦理的责任。它更接近于一种特殊的、斤斤计较的道德，或者至少接近于节省的原则。后者证明竞赛的目的在于：以压倒优势战胜假想的敌人，因

为对方也抱有同样的目的。这便是我们的合理行为的模式。这就极其确切地表明，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部分青年当中，而且，这是否就能证明，拥有大量财富就能维护法律和激励社会呢？

为了阐明其中的道理，我们不妨再看季索夫斯基的《成为当代人意味着什么？》一书中举的一个例子。

有一个孩子名叫沃洛佳，父母十分溺爱这个独生子。他从小就没有听说过严肃而又公正的“不”字。而当他渐渐长大，要求越来越高的时候，父母又无力来完成这个专横任性儿子的指令。他要买一支黑管，父亲尽管拿不出买这种乐器所需要的钱，还是愧疚地答应他：“再等几个月吧，我会买的。”可儿子不喜欢等。三天之后，正如应当预料到的那样，他偷了一所住宅被关进了监狱。“我真该咒骂我的父母，他在交待时说，“难道他们真弄不到钱来买这只该死的黑管吗？那样我就不会坐班房了。”

沃洛佳出狱之后，堕落得越来越厉害。然而，当这个年轻人在社会舆论面前为自己辩白，当他偶尔回顾过去的时候，他也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那种可怕的时刻，我想的是什么呢？因为我并非满脑子都装着物质享受啊！因为除了物质享受之外，我的心中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啊！”

造成这种可悲境地的原因其实十分简单：在沃洛佳的生活对物质享受看得太重，而对精神价值则未予重视。显然，正是这种精神生活的贫乏使沃洛佳堕落下去。上述关于皮袄和黑管的故事雄辩地证明：如果人企图用别的方式（通

过物)来在社会上肯定自己,他必然会落得一场空。缺乏人的意义的物,也会变得粗俗不堪。正如我们所证实的那样,它不会使人团结,而只会使人分裂;不会使人富有,而只会给人带来危害。沃洛佳和那个少女的悲剧在于,他们对待人就如同对待物一样。

“不过,对不起!”或许有的读者会反驳,“您自己就曾说过,人还可以通过时髦来肯定自己,也就是说,可以通过物来肯定自己。而且,这些话也说得不错:青年竭力借助于服饰来强调自己的个性特征,并尽可能地掩饰自己身上的缺陷。”

说得完全正确。问题的复杂性正在于此。不过,伊丽莎白女王可以通过一天换几次衣服来肯定自己,而仅仅只有一件节日服装的农家妇女却会将它一代一代往下传;照威尔士的说法,高尔基只有一套西装,而当时的某个耐泼曼^①却有几十件。

显然,对于高尔基来说,一件西装未免太少,而几代农民去穿一双靴子也远远不够。但伊丽莎白所拥有的也实在太多了一些,而耐泼曼西装革履地在饥饿和破产中招摇过市也并不雅观。

那么,需要多少物品才恰当呢?伊丽莎白必定会说,她的衣柜还需补充一打某种式样的裙子、耐普曼也不会限制自己。

^①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产阶级分子。

严格地说，人们对于物质享受的需要总是在不断提高的。房子、地毯、汽车、别墅、黄金……甚至普希金那个著名童话中的金鱼也无法满足老太婆的贪欲。最后，为了惩罚她危害金鱼自由的企图，金鱼让她的欲望落得一场空。那些将自己最美好的岁月、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全部精力用于追求漂亮物品的人，岂不也会落得一场空吗？

的确，人们是要打扮得漂亮一些，日子也要过得更有趣一些。卢那察尔斯基写道：“如果我做的杯子不好看，所用的玻璃不透明，有气泡，自然还是可以用它来喝水。然而，如果我们让大大小小的这类东西把人们包围起来，那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苍白无聊，单调乏味，郁郁寡欢。”然而，是否有人会满意自己的生活，日子会过得更加美好呢？全部问题在于，我们所谈到的仅仅是需要的一个方面，而需要这门科学可以分成好几个方面，至少是五个方面：

一、需要食品以维持人的生命。然后还有衣服、住宅、卫生和生理需要。上述身体需要的反面是贪吃，过分讲究穿著，酗酒和抽烟等。

二、高质量地满足身体需要。

三、需要通过社会经济需求（创造物质财富）、社会政治需求（保障自由与社会正义）、社会伦理需求（需要尊重周围的人，需要友谊和爱情等）、审美需求来肯定自己。

四、需要发展智力。

五、需要劳动。这是人类最高级的需要。当社会能够在自己的旗帜上书写马克思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句话

的时候，它就会达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照马克思的看法，人的需要应当是多方面的，如同其性情是多方面的一样，那时他才会拥有真正的财富——能够支配自然力，表现人的创造天赋。这就是为什么“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首先要以劳动本身的需要为前提。由于需要的范畴总是要超越并进而刺激生产范畴，所以生产得越多，需要的也就越多。人永远也不会由于物质需要而感到幸福——这只不过是沙漠中的一滴水，并不能解渴。人类的幸福是在劳动当中。

“按需分配”并不象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是分配物品，而是分配劳动。是指成为需要的劳动，那种成为我们生活的意义的劳动。

可见，这里是说，物质需要应有一个限度。过多的需要，无论这种需要表现在何处——比如食品、衣服、娱乐，都是违反天性的。破坏需要的限度就意味着自私，因为这种需要乃是基于炫耀：我有一条价值两百卢布的牛仔裤，你却没有。我有一本布面精装的小仲马的小说，你有吗？

对此，我们可以表示不同的看法。

要是一个人有额外收入（比如他饲养了一头鹿）他那么拿这笔钱去买什么东西，都不干谁的事。我们反倒应当感谢他，因为他增加了人民的福利：谁想戴一顶鹿角皮帽子——行！只是得付响当当的钱。难怪他会起早摸黑，不看电影，不到林中散步，也不读书看报。我们还应当感谢他总想把帽子做得漂亮一些，因为这有利于发展我们的审美趣味。

如果深思一下，就会发现问题的答案并非如此肤浅。不能不同意这样一点：为了得到额外劳动的收入，一个人要费多少力气。除此之外，他根据自己的精力情况而订出的作息制度也会被打乱。还有一点也并非不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选择合意的事来干，有时甚至会抛弃合心的专业而去选择符合他的首要原则的职业，这个原则便是：能否保证让他过上舒适的生活。

在上述情况下，即便是良好的手段也会导致一个人精神上的贫乏。他与社会的协调关系被破坏了，他的劳动不会具有高度的公民热情，因为人会由于所干的工作无聊而感到厌倦，变得性情暴躁。一个人如果沉迷于一己的幸福的错误观念，就会失去自己的一切优秀品质，变得精神颓废，有时甚至会完全毁了自己。

正常发展的真正条件是培养自己的高度文明，因为它的极终目标是为人性而斗争。只有文明的人才能理解别人，深入社会关系的本质，表现出善意。“除了善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优越的性格特征。”这是罗曼·罗兰引述伟大的受难者贝多芬的话说。贝多芬知道，人的真正财富是什么。“公爵！”音乐家对一个达官贵人说，“您所具有的，有赖于出身的机缘；而我所具有的，则有赖于我自身。现在的公爵和将来的公爵会有成千上万，而贝多芬却只有一个。”“如果一个人没有伟大的精神，”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指出，“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伟人，既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活动家，而只会成为庸俗市侩的无聊偶

像，时间会将他们一起吞噬，不留下些许痕迹。”

我们每个人的真正财富并不在于讲排场、摆阔气，而在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用善良、对亲友的关心、人性、高度的文明、美感等人类的真正品质来充实自己。无论是崇高的理想还是使人区别于动物的那些品质，都是不可能在商店里“弄到”或取得的。倘若缺少这些东西，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象欠了债一样难受。

单方面的发展会带来种种毛病，时间会在其中起作用。它会是一大堆无法解决的问题摆在拜物主义者们的面前。如不善交际，对自己不满，自暴自弃，深入膏肓的悲观主义等等。这种人最终将会落得一场空。

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全部悲剧在于，拜物主义者往往是一些绝顶聪明、天赋很高的人。他们用以自慰的是，他们能按“中等人”的标准生活，可以跟这些人交往。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知识财富，就不去开发自己的智力，从而削弱了自己的进取精神，模糊了美的清晰轮廓，分不清善与恶的概念。由于失去“主心骨”，人会变得主次颠倒。感染上“拜物病”杆菌的人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极力去结交可利用其地位来达到自己目的的人。而对于其他人，则从个人利害的角度去对待：看能否从他那里或者通过他弄到什么好处。“你给我好处，我也给你好处。”——这便是他们的主要哲学信条。奥列霍沃——祖也夫市的一个纺织女工曾在《真理报》上写到自己的邻居：“在这栋大楼里，大家都在谈论物质享受。他们到处去结识人，正象俗话所说的

那样，是出于实用的目的：看是否能够通过他人弄到什么东西？”

诗人叶甫杜申科在《贪财者墓志铭》一诗中，尽情嘲弄了这种“讲求实际的人：”

日用品商店的

经理

爬进

德国糊墙纸粘成的

意大利皮靴，

这样的东西

你也未必能抢到。

在粘满胶水的

粗大手腕上

白金表走得滴滴嗒嗒。

我们的炼胶能手跟炼金术士一样，

能把胶水

变成

白金！

……谁的房间里摆着没有读过的

巴斯杰尔纳克和茨维塔也娃的作品，

忧如心爱的家具。

你到底为什么要从那个

从未呼吸过“肯特”气息的

大学生那里

把它们弄来？

在托尔斯泰和陀斯托耶夫斯基的国度里

你急着奔向何方

卖馊子的商人？

但愿你受到诅咒

胃牌的炼金术士，

真资格的假货大王！

有时候，某些人也以物品的特征为标准来挑选生活中的伴侣。你们看，多洛斯塔辛幽默作品中的人物是怎么讲的：

“要想挑选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实在太困难了。我甚至羡慕那些下贱的贫民。你看，一，二——她就去搂他的脖子……”

当然，我也不是贵族。可是，天生的讲究穿著使我几十年来成不了家……你看，我现在仔细一瞧，她的牛仔裤上连商标都没有。我真伤透了脑筋：不知是不是那家公司卖的？有一家公司就曾经卖过假货。在商标的位置上印了一行自吹自擂的字。的确，印得十分巧妙，不过，重要的是，没有商店名称！当然要及时弄清楚才好，否则我就会受骗上当……”

实不相瞒，在我们的社会上还会碰到这种人，他们的名字就叫做市侩。坚决同市侩气息作斗争的高尔基把这种人称为市侩：“他们只能看见和接受事实的真相，而对于人类追求创造事实的真相却格格不入，不可思议。”这指的是那种不相信未来、回避尖锐斗争的人，那种因顾惜自己的安乐而不去创造的人。这也是一种市侩，尽管他们对闪光的商标和牛仔裤并不感兴趣。与此相反，有的人虽然会从时髦的物品中感

受到一种审美的满足，但他们并不因此就变成市侩。问题全在于如何对待物，有的善于运用物，有的则不然。在物质福利稳步增长的条件下，这一真理具有特殊的意义。马克思早就指出：谁若想享用众多的物品，谁就应当成为高度文明的人。

就其本质而言，市侩气息是一种社会现象。列宁强调指出：小市民为了适应各种社会生活而产生的道德变态，全然不是个人品质，而是一种社会品质。

在革命的疾风暴雨时期，市侩的嘴脸暴露得最为活灵活现。1905年，高尔基写了一篇名叫《关于灰色》的小说。直到今天，它仍具有毋庸置疑的现实意义。“红色和黑色在大地上发生了争执。在这场由真理的光辉骑士同权力的黑色魔鬼所进行的争论中，表现出真理的全部生命、全部美与痛苦，它的诗意与悲剧。

“渺小而又单调的灰色在黑色与红色之间跑来跑去，惶恐不安。他只爱温饱舒适，因而成天胆战心惊……他准备附和任何一方，只求能保住自己的舒适和安宁。对于他来说，全部生活乃是一面镜子，他在其中只看见自己。他的生命力很强，因为他惯会偷奸躲懒。他对什么都无所谓：反正有奶便是娘，无论是兽还是人，无论是白痴还是天才。他的灵魂——是名叫庸俗的癞蛤蟆的宝座；他的心是谨小慎微的藏身之所。他想尽情享受，但又怕受惊扰——这使他成了一个两面派和伪君子……灰色延迟没落事物的衰亡，阻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他永远是一切光明和勇敢的死敌……”

正如一切社会现象一样，市侩习气也有自己的渊源。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开始显示自己的力量、资产者个人登上欧洲历史舞台的时候。赫尔岑在19世纪上半叶，曾为当时的市侩描绘了一副绝妙的肖像。这位伟大的革命者说：“市侩的棱角是磨平了的，而没有棱角的人，一般都长得又肥又胖，他们有成打的衣服，既不是定做的，也不合身，可他们却穿了好几件。市侩家族已经失去了美的特征，可这个家族却日益兴旺……不过假使说他们有什么特别重要、特别突出的地方，那就是：他们的父兄既不爱散步，也不爱看戏，而他们却爱；那些人只是偶尔坐坐自家的马车，而他们自己则经常乘坐出租马车……”

“在非常突出的个性与超群的智慧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联系……对于花来说，他们的花圃里的肥施得太多；而对于花圃来说，他们的花又开得不好。如果说他们有时也去培植培植它们，那只不过是为了拿去卖钱。”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自己先辈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和传宗接代者。只是往昔的市侩哪象当今的市侩这样文质彬彬，富有教养！

伟大的十月革命消灭了市侩习气的社会根源：私人所有制和人剥削人的现象。然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是一件长期而又细致的工作。它必须克服经济、道德和审美诸方面的重重困难。我们希望大家不要把注意力只停留在通过每个人内心世界的复杂体系折射出来的外部作用上。

我们在谈到存在决定意识的时候，有时会忘记另一方而

——意识也会对存在产生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会忘记人与周围世界的相互作用。在行为美学中，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的行为是其个性的表现，因而总是带有他对于社会的具体态度的烙印。遗憾的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倾向尚不能保证每个人的行为都不越轨。

我们看到，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远比乍看起来复杂得多，矛盾得多。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实表明，道德的发展进程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

每个人都不是直接“享用”外部世界影响的结果。著名心理学家列昂季耶夫说：“个性如同人从自身创造出来的东西，被用来肯定自己过的是人的生活。它在日常事务和交往中，在人将自己的一部分分给他们的人群中，在阶级斗争的堡垒中，在为祖国而战的疆场上肯定这一点，有时甚至有意识地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肯定这一点。”

时间象汹涌澎湃的山洪向前飞奔，呼唤我们每个人加快速度。

人能在自己身后留下什么呢？是金字塔和钢筋水泥的摩天大楼？还是花园、人造森林和人造海洋？不错，是这些以及其他东西。然而，除此之外，人还会在自己身后留下足迹，只不过它是挠不着的，但却能使人想起自己的东西。我们内在的美和外在的美会在别人心中留下何种印象呢？我们在同代人的心中铺设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

“成为既照亮别人又照亮自己的光，”捷尔仁斯基说，“这就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幸福。”

译 者 序

人总是处在某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总要与他人交往，不能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如何与亲人、朋友、同志相处，如何在与他人交往中表现出高尚的情操，举止得体，如何使自己的穿戴美观大方、富有个性而又与环境协调……。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关心这些问题。特别是青年朋友们，他们在按照美的理想来改造世界、建设世界的同时，也日益自觉地按照美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热忱地追求心灵美、语言美、外貌美与人际关系美的高度统一。针对人们这种新的需求，苏联学者阿·费迪教授写了《美育》（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84年版）一书，这本深入浅出的著作包括两部分：劳动生产美学和交际美学。现在奉献于读者面前的，便是该书的第二部分的译文。

译文付印前，承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盛意，转来了本书作者阿纳托里·米哈依洛维奇·费迪专为此中译本所写的自传。译者不敢自秘，摘要译述如下，俾使我国读者对他有所了解；同时也借以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向费迪教授表示由衷的谢意。

阿·费迪1935年生于顿巴斯的乡间，系顿涅茨克大学毕业生。初任中学教员和校长，后在教育学院讲授马列主义美学，现在是国立斯拉维扬教育学院哲学和